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二十一)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一九八一年一月

目 录

- 揭发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搞“第二武装”的滔天罪行.....朱万国(1)
- “四人帮”反党乱军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揭发批判“四人帮”以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破坏警备区部队建设的罪行.....章尘(10)
- 揭发批判“四人帮”搞“第二武装”，大整人民武装部的反革命罪行.....徐汇区人武部(25)
- “三位一体”是“四人帮”篡党夺权、搞“第二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自动化仪表三厂民兵营(30)
- 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利用旅社民兵为“稳住上海，搞乱外地，乱中夺权”反革命方针服务的罪行.....静安区服务公司旅社中心店民兵连(37)
- “四人帮”及其爪牙要民兵“立法、管法、执法”是个大阴谋.....中共红色线厂总支委员会(44)

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插手上海站联合办公室进
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上海铁路分局民兵师(52)

揭发批判“四人帮”及马徐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马关根(60)

揭发批判“四人帮”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在虹口区的
罪行……虹口区人武部(68)

揭发“四人帮”为武装叛乱大搞物资准备的反革命罪行……陈捷(74)

要不要坚持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的双重领导制度……上海警备区(78)

假左真右的法西斯黑货

——剖析“四人帮”鼓吹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恶
毒用心……静安区人武部(81)

必须划清“帮武装”与民兵的界限……上海无线电十五厂民兵连(85)

驳斥“四人帮”对民兵的诬蔑……杨浦区人武部(88)

关于编印本期资料的说明

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军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深入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本期从大量的揭批材料中，选择了若干篇揭批“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罪行的材料，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上海军民同“四人帮”的斗争。收录时，我们对个别提法作了一些删改，其余均照原样刊出。

资料组

揭发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 搞“第二武装”的滔天罪行

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 朱万国

王、张、江、姚是一伙祸国殃民的黑帮。长期以来，他们一方面拚命制造反革命舆论，进行政治欺骗；一方面拚命抓枪杆子，进行军事冒险。他们反军乱军，要篡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军权。他们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破坏民兵建设，苦心经营同解放军相对立的“第二武装”。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就狂叫，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叛徒江青也抛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竭力推行他们那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第二武装”就是“改朝换代”的产物，就是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

恩格斯说：“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使尽了种种阴谋诡计。他们竟然伪造所谓“改造民兵”的指示，竭力利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进行招摇撞骗。张春桥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的一个“请示”中，接过江青“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伪造了一个所谓“改造民兵”的指示。一九七三年七月，“四人帮”又加以重印，并由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附了一封黑信单独寄给上海，胡说“对待文攻武卫这个问题”，“是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还是扼杀这一新生事物，实际上是存在着斗争”。此后几年中，马、徐、王及市民兵指挥部坏头头李彬山、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等，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喋喋不休地叫嚷什么“关于改造民兵的伟大思想”，借以欺世惑众，蒙蔽人民。

他们为了使“第二武装”能够在“理论上站得住脚”，肆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拼命制造所谓“理论根据”。特别是一九七三年以后，他们一再引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关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等几段语录。革命导师的这些教导，是为了指导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导师所说的“代替”，就是要砸烂资产阶级专政的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四人帮”却丧心病狂地要把毛主席亲自缔造、领导的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民兵和公安部门都一概作为旧的国家机器而彻底砸烂；要用他们“重建”的那个民兵来取代，要“新桃换旧符”。

他们为了使“第二武装”合法化，煞费心机地以合法的形式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三年初，王洪文、张春桥指派《人民日报》国内部的纪希晨来沪总结上海民兵经验，并在全国推广。纪根据张春桥、王洪文的观点和马、徐、王及李彬山、钟定栋等人提供的材料，炮制出一篇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支强大力量》的文章，副题是《上海城市民兵狠抓阶级斗争的情况调查》。他们断章取义地引用了革命导师的一些语录，要在党报上公开提出民兵“重建”的问题；公开为“第二武装”贴上“新生事物”的标签；诬蔑过去的民兵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提出“把民兵、治安保卫、消防、人防等组织，统一于一个部门管理”。还包藏祸心地大肆吹捧上海民兵“起了解放军起不了的作用，起了专政机关起不了的作用”，极力贬低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专政柱石作用，否定公安局、法院的职能。黑文出手后，这个人赶忙给徐景贤、李彬山写信说：“给张、姚、王中央负责同志的小样，已分送。”但当时“四人帮”怕太露骨，没有敢马上发表。王洪文说：“我和春桥把它压下来了”，“什么时候见报还要再看看”。显然，他们就是要窥

测方向，以求一逞。在一九七四年十月总参召开民兵组训工作会议期间，王洪文、张春桥通过民兵指挥部坏头头吴立义为他们搜集会议情况，提供“炮弹”，并到会大放厥词，含沙射影地大整中央军委和总部的领导同志。他们一唱一和，张春桥十分阴险地说：“今天还讲话吗？讲话有困难！讲，与你们的会议不一致，与《纪要》不一致！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我要赞成，你们的会议路线不对头。我要不赞成，讲了使同志们思想混乱。”王洪文也说：“有的同志还是解放初期的办法搞民兵，停留在过去的老一套上，那怎么行呢！”对组训工作会议大打棍子，全盘推翻，妄图把民兵组训工作纳入他们修正主义路线的轨道。

他们为了搞“第二武装”，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全盘否定在毛主席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的全国亿万民兵，大肆污蔑广大民兵是什么“路线不正”，“一冲就垮”，“没有战斗力”等等。与此相呼应，他们极力标榜自己是“新生事物的支持者”、“城市民兵的创始人”，大肆鼓吹“重建”民兵是什么“战略”的需要。周宏宝甚至赤裸裸地说：“我认为建立两支武装好，一支是军队，一支是民兵，有了这两支武装，相互可以牵制。”他们所说的“牵制”，就是要对抗解放军、取代解放军。他们把自己搞的那一套，一概封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民兵建设的新鲜经验”。如不按他们那一套去做，就给你扣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新生事物”的大帽子。他们组织人员编写什么理论教材，编纂所谓“文攻武卫”成长史，进行所谓“文攻武卫”的传统教育，要文艺出版单位写“第二武装”题材的小说，演“第二武装”题材的戏，拍“第二武装”题材的电影，要报社、电台连篇累牍地宣扬他们的所谓“新鲜经验”，甚至要全国各省、市来上海“取经”。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

他们为了搞“第二武装”，扯起所谓“打烂军事一条线”的黑旗，疯

狂地破坏毛主席关于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千方百计地排斥军事机关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另立民兵指挥系统。他们背着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大搞“两部合并”，擅自砍掉人民武装部；大搞“三位一体”，以工厂武保组，代替人民武装、治保、消防组织；以公社民兵团部，取代公社人民武装部。王洪文还提出“先把基层搞好，然后逼着上层建筑改革”的反革命策略，妄图要挟中央成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作为“第二武装”的司令部，以便上上下下，从全国到基层形成“第二武装”的指挥系统。

他们为了使“第二武装”能够与人民解放军相对抗，大量配发武器装备，拼命扩充实力。几年中，已配备枪枝几十万件，火炮几千门，大大地超过了原规划的速度。他们计划再装备几十万件武器，组建十个高炮师和筹建一三〇地炮师、水陆坦克师，要搞什么摩托“快速部队”。已经花了上百万元新造了一条“上海民兵一〇一艇”，还要造“一〇二艇”。他们破坏国民经济计划，拨出巨额经费，私设军火工厂，特设军火车间，私自造枪造炮。

他们为了使“第二武装”能“自己指挥”、“单独作战”，叫嚷“要培养工人阶级的指挥员”。王洪文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把我们这支队伍建设好，就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这支队伍不要被人指挥”。因此，几年来，他们处处撇开人民解放军，浦江架桥演习单独干，民兵军事表演单独干，高炮打靶单独干，巷战训练单独干。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四人帮”是一伙利令智昏的反革命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们在上海不遗余力地拼命搞“第二武装”，还妄图进一步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全国扩展势力。一九七三年以后，一些兄弟省、市的同志先后来上海参观学习。马、徐、王以及原民兵指挥部的坏头头们秉承“四人帮”

的黑旨意，在接待工作中，大搞阴谋诡计，大肆兜售所谓“新鲜经验”，借机搜集各地情报，掌握来访者的政治态度，对有不同看法的又打又压，甚至组织围攻，硬要外地同志学上海的路子，听他们的指挥，阴谋把上海民兵指挥部当作民兵的领导“中心”。“四人帮”原指望他们的黑旗一树，八方呼应，就可以实行武力篡权，但历史已无情宣告：这只是他们的痴心妄想！

几年来，“四人帮”利用手中控制的“第二武装”，大肆镇压革命人民，大搞反军乱军，大反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甚至丧心病狂地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四人帮”利用“第二武装”，打着民兵要抓阶级斗争的幌子，鼓吹民兵不仅要“执法”，还要“立法”、“管法”，不经过公安部门，随意抓人、关人、审讯定案。被他们抓、关的人中，除少数罪行严重应由公安部门和法院逮捕法办的外，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被非法关押。有的纯属反对“四人帮”而长期惨遭迫害。有的甚至是党员负责干部，他们也利用“第二武装”任意抓、关。不仅如此，对“四人帮”及其余党阴谋篡党夺权只要稍有不满意，即使是过路旅客，他们也不放过，轻则勒令到民兵指挥部报到，写检查；重则抓起来大整特整。有一个县是王洪文、马天水在郊区搞“第二武装”、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点。市指挥部的坏头头钟定栋秉承“四人帮”和马、徐、王的旨意，在该县私设监狱达二十四处之多。前后不到三年时间，就抓了三千九百九十九人次，以各种形式“扭送”的有五千七百六十一人次，其中关押了二千六百四十四人次。他们靠了“四人帮”的“帮法”，抓人名目繁多，关人肆无忌惮，打人不择手段。想抓什么人就抓什么人，要定什么罪就定什么罪。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稍有反感，要抓；连说几句公道话，也可以扣个“无理取闹”的罪名抓起来。有一次，钟定栋看到一个青年裤脚管

大一点，就下令关起来。还有一次，钟定栋坐小轿车经过哈密路时，几个小孩对着车子“哇”了一声，他凶相毕露地讲：“好啊！我找都找不到”，抓了一个小孩就走。对被抓被关的人，滥施种种残酷的肉刑，如吊打、捆绑、上手铐、跪砖头、喷气式、晒太阳、臭马桶、烟头烫、套马桶盖，还有罚立、罚饿、不准睡觉、喂蚊子、钩鼻子等等。有的被搞成残废，有的被绑死，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逼得投河、上吊自杀。可是，“四人帮”及其余党视人命为儿戏，市民兵指挥部的坏头头钟定栋气焰嚣张地说：“新生事物么！那有十全十美的”，“总要付点学费嘛！”坏头头周宏宝也穷凶极恶地说：“黄浦江那么大，又没有盖子，要自杀有什么办法呢？！”真是反动透顶。

二、“四人帮”利用“第二武装”进行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上海民兵指挥部是“四人帮”“第二武装”的司令部。长期以来，他们利用这个据点，大搞反军乱军的罪恶活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在北京“放火烧荒”，马、徐、王就在上海“点火放炮”，他们指使民兵指挥部的坏头头李、施、吴、钟等人，大反警备区、南京军区和解放军三个总部。一九七四年二月中旬，经过坏头头的精心策划，在上海民兵指挥部里贴出了两张矛头指向解放军的大字报。市指挥部的坏头头连夜把它打印上报下发，并召开各区指挥部和直属师、团负责人会议，狂叫“这两张大字报，起了点火放炮的作用”，逼着大家表态、支持。在他们的疯狂煽动下，短短两三天，指挥部反军乱军的大字报纷纷出笼，妖雾弥漫。马、徐、王得知指挥部这股反军乱军的野火烧起来了，得意忘形，一面向主子汇报，一面火上加油，说什么“我们支持你们”，“大字报要引导，揭问题要集中，重点要抓住，可以点周司令、刘政委、章副政委的名。”过了几天，马天水、王秀珍、金祖敏等借口到上海民兵指挥部宣布“领导班子”，搞突然袭击，组织围攻周司令。他们左一

个“市委支持你们的行动”，右一个“民兵指挥部的运动跑在全市前头了”，竭力为指挥部几个坏头头撑腰打气。不久，指挥部的坏头头根据“四人帮”及马、徐、王的黑旨意，又在指挥部煽动说：“警备区是马蜂窝，过去没有捅，现在要捅，可以向警备区送大字报。”紧接着，炮制了一大批点名攻击警备区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坏头头钟定栋等人赤膊上阵，亲自带着一帮人，冲进警备区机关刷大标语，贴大字报。马、徐、王和市指挥部的坏头头还窜到基层工厂和区指挥部，煽阴风，点鬼火，指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也向警备区送大字报。几天之内，把警备区机关搞得不得安宁。他们还策划一些人到南京给军区送大字报，阴谋把反军的鬼火从上海烧到南京，再从南京烧到北京，妄图把军队的领导机关搞瘫痪，把军队搞乱，以便乱军篡军，乱中夺权。在“四人帮”一手导演的反军乱军大合唱中，上海民兵指挥部成了大反警备区的串连站，成了反军乱军的火线指挥部。

三、“四人帮”利用“第二武装”，大反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四人帮”及马、徐、王阴谋篡党夺权，整理，印刷了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大量黑材料，成千上万地发给“第二武装”，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民兵系统到处大谈民兵的主攻方向是所谓“党内走资派”。别有用心地散布：“你们要想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只抓那些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要看到“主要危险是走资派”，要市、区两级指挥部把工作重心转过来，要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民兵，把工作完全放在揪“走资派”上。例如，他们要旅社民兵揪“走资派”、公开提出“旅社民兵与党内走资派斗争是重点，是抓阶级斗争最重要的方面”，并要专门总结“努力把旅社办成与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阵地”的所谓经验。

四、“四人帮”阴谋利用“第二武装”搞武力篡权。伟大领袖和导师

毛主席指出：“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去年十月六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两个阶级生死搏斗的紧急关头，采取英明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四人帮”刚一落网，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就妄图利用“第二武装”，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公然以武力对抗党中央、对抗华主席。在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中，“四人帮”的余党，王洪文的一帮“小兄弟”和市民兵指挥部的一小撮坏头头，是死心塌地的、拚着命干的。他们书写猖狂一跳的手令；召开垂死挣扎的黑会；炮制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宣言；制定负隅顽抗的叛乱方案；部署“决一死战”的兵力，设立指挥点，架设电台，规定口令，突击下发武器弹药、腾出关人的牢房，狂叫“十年心血在于此”，“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千，要马上干”。甚至策划断水断电、炸毁桥梁、封锁机场、堵死航道，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四人帮”这伙反革命黑帮原来一心想“威赫赫，爵禄高登”，那知道却是“昏惨惨，黄泉路近”。党中央华主席一声号令，上海工人阶级、广大干部群众，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立即行动起来，把“四人帮”及其死党打得落花流水，迅速覆亡。一枪未响，一滴血未流，干脆利落地解决了问题。“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被粉碎了，他们经营的“第二武装”也就以彻底破产告终。

上海广大民兵是坚定地站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的，在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四人帮”及马、徐、王在民兵工作中拚命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我们决不能低估。我们决心在以华主席为

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在上海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大力整顿民兵，大办民兵，办好民兵。在民兵中进一步开展大学习、大揭发、大批判，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把上海民兵建设搞好。

（本文选自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上海市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反革命罪行大会的发言）

“四人帮”反党乱军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揭发批判“四人帮”以及马天水、徐景贤、
王秀珍破坏警备区部队建设的罪行

上海警备区副政委 章 尘

同志们：我代表上海警备区揭发、批判和愤怒声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及追随他们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反党乱军、破坏警备区部队建设的罪行。

长期以来，“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及马、徐、王为了篡党夺权，千方百计地想把人民解放军搞乱，把兵权趁机夺过去。出于这种反党乱军的反革命野心，他们也把黑手伸进我们上海警备区，妄想把警备区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但是，我们警备区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尽管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对我们进行高压，但是大家还是和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被他们拉过去，跟着他们跑的，只有副司令张宜爱、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等少数几个人。正因为如此，“四人帮”对警备区恨之入骨，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整警备区，干了许多许多的罪恶勾当。

(一)他们破坏警备区批林批孔运动，想趁机把警备区机关、部队搞乱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主席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

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毛主席的批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四人帮”破坏批林批孔的罪恶阴谋。“四人帮”是知道毛主席的这个批示的，可是，他们毫无悔改之心，一意孤行，继续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对批林批孔疯狂进行破坏。他们妄想利用批林批孔把全国搞乱，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王洪文有一次在和王秀珍密谈时，不打自招地说，“我已经批了铁道兵、总政、总参的一些来信，那里的火已经点起来了。警备区也有许多来信，炮弹在我手里”。马、徐、王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在上海一不批林，二不批孔，也不批林彪在上海的死党王维国的种种反革命罪行，而是大整特整各级领导干部，大整特整上海警备区。妄想把警备区机关、部队搞乱。为此，他们费尽了心机，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

第一，他们公然违背中央指示精神，不让警备区党委领导运动。

中央文件讲得很明确，批林批孔运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可是，“四人帮”以及马、徐、王把警备区党委撇在一边，另搞一套。他们派记者、联络员到警备区来当“钦差大臣”，同时对张宜爱、李彬山等极少数人实行单线领导，另外他们还改组了批林批孔办公室，让这个办公室凌驾于党委之上，随意发号施令。警备区党委完全被他们架空了，警备区运动的一切大大小小的问题，都由他们策划于密室。当时，新华社上海分社的一个记者和市委的一个联络员，在警备区的活动是极不正常的。那个记者口口声声自称是中央政治局派来的，到处指手划脚，他想点谁的名就点谁的名，想批谁就批谁。而且大搞特务活动，以卑鄙的手段，暗中指使政治部的一个干部给张、王写诬告信，把警备区说得一无是处。张、王收到材料后，马上施展其惯用的“借刀杀人”的毒辣手法，左一个电话，右一个批示，说“现在是彻底揭开警备区领导机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的时候了”。马、徐、王

得到了张、王的“上方宝剑”，立即策划召开市委常委、警备区党委常委参加的两委会，拼命给我们施加压力，强迫我们做检讨。并且蛮横无理地责问警备区一些领导同志调到上海来工作是谁叫来的，是带着什么感情来的，甚至责问我们是带着什么任务来的。整得周纯麟同志当场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才不得不暂时休会。“两委会”虽然暂时不开了，但是，马、徐、王为了破坏警备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紧接着又使出更多的诡计。

第二，他们还公然违背中央文件精神，煽动一些人大搞串连活动。

“四人帮”和马、徐、王知道，他们借批林批孔整警备区的阴谋是不得人心的。于是他们一方面赤膊上阵，多次窜到警备区机关大院，以看大字报为名，进行煽风点火；另一方面又指使一些人大搞串连活动。本来，警备区机关的运动，只应该限于警备区机关的人员参加。可是他们却竭力煽动警备区一部分在地方支左、甚至已经复员转业多年的同志，回警备区参加运动。马天水、王秀珍还亲自给一些组办打电话，说：“警备区在地方支左的同志，如果要回去参加运动，你们要给予方便，大力支持”。徐景贤更露骨地说：“不让串连，但可以搞革命的串连嘛。”为了把警备区搞乱，他们还不惜破坏上海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之间的鱼水关系，策动民兵指挥部的同志到警备区机关大院贴大字报，刷大幅标语。完全是破坏军民团结的罪恶行径。

第三，他们以“搞正路线”为名，上批南京军区，下整师、团部队。

“四人帮”以及马、徐、王为了篡党夺权，当然不以搞乱警备区机关为满足。他们以“搞正路线”为名，上要整垮南京军区，下要整乱师、团部队。他们一心想把火先在我们警备区点起来，把警备区搞乱，打开缺口，然后再烧到南京军区去，把整个南京部队搞乱。为此，马、徐、王秉承王洪文的黑旨意，还秘密策划警备区的一些人到南京军区

送大字报，连大字报的标题，都是马天水亲自加以修改的。临走还交待，到军区送大字报时要突然，事先不能让军区知道。甚至交待可以采用冲的办法。用心真是险恶。对师以下部队，他们也不肯放过。中央一九七四年十七号文件讲得很明确，运动只在警备区机关搞，师以下部队是进行正面教育。可是，马、徐、王强迫师、团也要层层搞，大整对“四人帮”持有不同看法的领导。当一个师的部队被他们搞乱，大家都很焦急和痛心的时候，王秀珍却幸灾乐祸地说：“×师形势很好，我表示祝贺”。短短两句话，把“四人帮”以及马、徐、王一伙反党乱军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他们就是一心要把警备区部队搞乱而后快。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可是，“四人帮”和马、徐、王看到人民军队被搞乱了，反而高兴。他们站在什么立场，怀着什么感情，不是很清楚吗！

（二）他们策划所谓“刹回潮风”，妄图

夺取警备区的各级领导权

去年三月份，他们又别出心裁地搞了个所谓“刹回潮风”，目的是把所谓积极分子安插到关键性的岗位上去，垒头山，搞宗派，结党营私。事先，他们煽动一些人，一方面写诬告信，告黑状，另一方面向警备区党委施加压力。“四人帮”和马、徐、王一接到这些所谓群众来信，马上就找警备区领导谈话，要挟警备区党委召开所谓交心通气会。在会议之前，还精心策划了一些所谓座谈会，名曰听取群众意见，实质上是组织一帮人轰警备区领导。参加座谈会的名单，全是由张、李、杨指定的，而且规模越开越大。党委交心会以后，又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接着司、政、后机关和各师、团层层开会，一直搞到支部，大

刹所谓“回潮风”，大搞人人过关。批判的面越来越大，从警备区领导，到警备区机关的处长以及师、团的领导，以至一般的参谋、干事，他们都随意点名，乱整一通，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完全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

在所谓“刹回潮风”后期，他们捏造什么警备区的组织路线不端正，甚至胡说什么在警备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土围子”需要炸掉，首先在警备区机关各处普遍改选支部，竭力把他们信得过的人塞进去，而把他们信不过的人拉下来。接着又炮制了一张“升官图”，以落实政策为名，提出了一份七十八个所谓受排挤打击的干部使用名单，把这些人分别安插在机关、部队的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这就是他们大搞所谓“刹回潮风”的真正目的，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搞正路线”的真正标准。“升官图”是秘密炮制的，然后突然拿到党委面前，逼着党委讨论，只是由于大家的抵制，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三) 他们支持一些人，压一部分人，大搞分裂警备区党委的阴谋活动

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证明，凡是政治上搞修正主义的，在组织上必然搞分裂，搞宗派活动。毛主席针对“四人帮”搞宗派活动，尖锐地指出：“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可是，“四人帮”拒不接受毛主席的多次批评教育，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宗派活动。他们对警备区领导软硬兼施，反革命两手并用，千方百计地进行分化瓦解。他们拉一些人，排挤、打击、迫害警备区主要领导和 other 领导同志。为分裂警备区党委费尽了心机。他们结党营私，自成体系，力图通过亲信张、李、杨控制警备区。因而经常背着警备区主要领导，找张、李、杨密

谈，了解情况，作黑指示。有些事情如需要找警备区主要领导的，也往往是先找他们几个人谈过以后再把主要领导找去。为了控制警备区，马天水还根据王洪文授意，直接插手警备区党委的分工，指名叫张宜爱管作战，叫李彬山管干部，叫杨新亚管警卫。马天水怕这样还不保险，竟然对张宜爱说：“你要管作战，如果他们把你架空，你可以写信给我，我给你向上转（指向“四人帮”转）”。从这次他们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来看，“四人帮”和马、徐、王要张、李、杨抓权，其罪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的吗？！

“四人帮”和马、徐、王对于不愿意跟他们走的警备区其他领导同志，则是想方设法地扣帽子，打棍子，一定要整倒、搞臭，赶走才甘心。批林批孔和所谓“刹回潮风”中，他们大整周司令员、刘政委、章副政委和其他领导同志，今年以来，又大整周、李（政委）、章和其他领导同志。今年二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他们竟然践踏党的组织原则，不让主持党委工作的李宝奇政委去参加会议，却指定他们的亲信李彬山代表警备区参加。而且事前也不跟警备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李彬山到了北京，王洪文造谣地对李彬山说：“李宝奇的历史，你要了解一下”。这完全是搞政治陷害。而且不通过党的组织，私自叫一个副政委去了解政委的所谓历史情况，这在我们党内也是奇闻。王秀珍也公开造谣说：“李宝奇是邓小平派来的”，并且在全市到处散布。他们为了排挤打击一个同志，手段竟然卑劣到了这种程度。今年夏天，马天水还公然煽动张、李、杨给张春桥、王洪文写黑信，告李宝奇同志的状。马天水对张宜爱说，“不光是基层干部可以给张、王写信，你们领导干部也可以写嘛！”于是，张、李、杨就在李彬山家里密谋策划写了黑信，想从张春桥、王洪文那里捞个所谓批示来，整倒李宝奇同志和警备区的其他领导同志。还有如在《万山红遍》一幅年画

上大做文章。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南京军区有个业余美术创作人员画了一幅年画，题为《万山红遍》，原来画面上将马列著作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那本小册子并列在一起，在制版过程中，作者提出要将画中张的小册子删去。这一下可触犯了马、徐、王的黑主子，马天水为此暴跳如雷，一天几次电话，限时限刻要我们写出检查，并且亲自找一个青年干部谈话，搞诱供、逼供，说什么：“只要你说出来，没有你的事，那是上头的问题”。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他们原来是想利用这件事，来整警备区、南京军区和中央的领导同志。马、徐、王对于触动了他们主子的问题查得那么卖劲，可是，对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人却加以包庇。我们警备区某师有个干部散布恶毒攻击毛主席的言论，并且叫嚷让王洪文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这个揭发材料寄到马天水那里，马天水连一个字也不批，推给信访组转给我们了事。当时，我们感到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问题，立即派人调查。但是马、徐、王却暗中对调查工作设置障碍，指使人出来包庇这个干部，说这是模糊认识。两相对照，马、徐、王恨谁爱谁，不是很清楚吗？

（四）他们把黑手伸到好八连，妄图把

毛主席树立的红旗拔掉

好八连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好八连命名以后，毛主席亲自写了光辉诗篇《八连颂》。多年来，好八连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部队各级党委领导下，做出了不少成绩，受到了军内外的热情赞扬。可是“四人帮”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通过各种渠道，把黑手伸到八连。批林批孔初期，“四人帮”就通过他们的“记者”散布流言蜚语，胡说什么：“八连要垮，垮就垮在警备区领导的指导思想”。警备区除了要求八连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建设连队外，并没有提出别的指导思想。所以

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毛主席的《八连颂》的。一九七四年以来，马、徐、王还有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学着江青的那套手法，多次窜到八连，又是送书，又是讲话，鼓动八连干部、战士到地方串连。八连的干部、战士和机关的干部，对他们的那一套是有反感的，有的问究竟是按照《八连颂》建设连队，还是按照别的什么标准建设连队。

“四人帮”和马、徐、王破坏八连建设，还有一手，就是另树一个三连（担负警卫市委机关任务），跟好八连唱对台戏。他们派出自己的亲信，到三连蹲点。他们亲自送材料，作指示，散布谣言，制造舆论，竭力搞乱部队的思想，妄图把连队建设引向邪路。他们甚至别有用心地要三连搞什么“上调查”、“下报告”的试验，就是要三连派人到上级党委去进行“调查”，要机关派人到连队去作串连报告。还公开授意炮制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军内”的“经验”。三连的广大指战员对他们的阴谋是有抵制的。但是他们不顾三连干部战士的反对，硬把它说成是新鲜经验，向八连和其他连队施加压力，一心想把部队搞乱。

“四人帮”插手八连，更恶劣的一手，是不择手段地挑拨八连与警备区的关系。去年冬天，王洪文亲自布置朱永嘉派人到八连调查，他们把警备区领导机关撇在一边，还特别交待，调查的材料不要给警备区领导看。八连是警备区的一个连队，为什么八连的经验不能给警备区领导看？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基层单位搞挑拨离间么！马、徐、王还指使人鼓动八连的同志给“四人帮”写信，告警备区领导的状。

“四人帮”为什么千方百计地把黑手伸到好八连呢？就是妄图拔掉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把八连搞成不听各级党委领导，只跟“四人帮”控制的喇叭头转的连队，然后通过他们一度控制的宣传大权，妄图把整个军队建设引向邪路，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用心真是恶毒。“四人帮”和马、徐、王对八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五) 他们竭力制造上海民兵和警备区的对立，妄想把上海民兵变成“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

毛主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中国革命的实践雄辩地证明，毛主席关于建立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一系列教导，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传家宝。可是“四人帮”和马、徐、王，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在民兵建设上另搞一套，破坏党对民兵工作的领导，破坏民兵同解放军的血肉关系。他们为了把民兵搞成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千方百计地想把民兵的领导权抓到手。王洪文在一九七五年九月接见民兵指挥部的人员时，讲得十分露骨。他说：“民兵的组织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危险。”为了解决所谓组织问题，他狗胆包天地背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搞什么“两部”合并。并且放肆地说：“我就不相信武装部能把民兵管起来，谁要把民兵指挥部搞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还要把它拉起来。”反革命的气焰何等嚣张！马、徐、王紧跟王洪文，亦步亦趋，卖力地推行“两部”合并的黑货。什么“两部”合并？！实际上就是要把人武部一口吞掉。我们警备区当时对这样做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这是涉及到军队体制问题，涉及到人武部门干部的工作安排问题，因此决定给军区报告。可是王洪文作贼心虚，马上指使秘书打电话给警备区，说：“这个问题暂不报军区。”他们既要这样干，又不让南京军区和军委知道，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在搞阴谋诡计吗？

他们不但要通过“两部”合并把人武部吃掉，还通过种种卑劣手段，在民兵中散布南京军区和警备区的流言蜚语，说什么“南京军区

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警备区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甚至把警备区批林批孔中，未经核实的大字报汇编，拿到民兵指挥部举办的民兵干部学习班上宣读，说“这是进行路线斗争教育”。明目张胆地制造民兵和军队的对立。他们的野心很大，甚至妄想成立所谓全国民兵总指挥部，同中央军委相对抗。

特别恶劣的是，他们不但千方百计地破坏上海民兵与警备区的关系，还丧心病狂地要民兵把枪口对着警备区指战员。不仅在这次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中，他们也把我们警备区作为当面之敌，而且早在警备区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就下令民兵加强战备。他们妄图挑动民兵把枪口对着解放军，真是罪该万死。他们的这一切阴谋活动，都是背着上海广大民兵干的。“四人帮”挑动民兵反对人民解放军，只不过是痴心妄想，是永远也不会得逞的。

(六) 他们借口一元化领导，破坏南京军区党委、上海市委对警备区的双重领导关系

“四人帮”和马、徐、王打着要服从一元化领导的幌子，梦想要警备区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转。马、徐、王在军内，在我们警备区没有任何职务，可是却成了警备区的“太上皇”。他们对警备区的什么事情，都要插上一手。连哪个干部要提升，哪个干部要调走，都要通过打电话、写指示，叫我们警备区照他们的旨意办。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警备区有个基层干部，本来组织上已经决定他复员回原籍，就是因为这个干部说了他们的好话，他们便无视军队系统的规定，也不顾关于控制城市人口的规定，硬要我们把他复员在上海。更令人气愤的是，徐景贤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时，竟仿效林贼的做法，公然下“手令”

来指挥警备区的部队。

我们说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要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一条根本原则。我们上海警备区有双重领导关系，就是既要接受南京军区党委的领导，也要接受上海市委的领导。“四人帮”和马、徐、王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诬蔑南京军区是错误路线，妄图要我们摆脱南京军区的领导。有些工作，按照正常的做法，是应该向军区请示报告的。可是他们却不准我们请示报告，而且还要拿“不服从一元化领导”的大帽子压我们。例如，马、徐、王不按中央规定，擅自指示我们提前扩大传达中央文件的范围，我们就是一边执行一边向军区汇报也不行，诬蔑我们不接受市委的一元化领导，并且在全市大造谣言，说警备区不传达中央文件。我们机关搞了个民兵工作简报，向军区反映民兵工作情况，徐景贤就说我们是搞“多中心”。可是，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南京军区给我们下达的指示，发的有关文件，甚至连军区出版的小报，都要我们报给他们。他们这样积极搞南京军区的情况干什么？就是为了拿来作为整南京军区某些领导同志的炮弹。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一元化，就是要控制我们警备区，使警备区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七)他们肆无忌惮地践踏党的原则，大搞阴谋诡计，干尽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四人帮”以及马、徐、王一伙，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手里没有真理，周围没有群众，极端孤立，极端虚弱，就必然要靠搞阴谋诡计过日子。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机会主义者搞阴谋诡计的卑劣行径时，非常尖锐地刻划了他们的丑恶嘴脸。马克思、恩格斯说：“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

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四人帮”和马、徐、王为了篡党夺权，继承他们的老祖宗的衣钵，大搞阴谋诡计，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他们搞阴谋诡计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大开黑会。批林批孔运动中，马、徐、王曾经多次背着警备区党委，鬼鬼祟祟地把警备区的一些人找去，搞什么秘密接见。他们一手策划的警备区三个半天的所谓揭发批判大会一结束，徐景贤、王秀珍就连夜把警备区的一些所谓“积极分子”集中到某单位去密谋策划。据揭发，当时徐、王得意忘形地说：三个半天的大会开得很好，你们第一炮打响了，北京的几位领导（指张、姚、王）听了很高兴，可惜没有录音，如果录了音，他们听了会更加高兴。徐、王还说，警备区批林批孔的重点是周、刘、章，还有董（副司令员董常云）、孙（副司令员孙林瑞）。王秀珍说，批林批孔运动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接着指着张宜爱、李彬山对其他人说，他们就是你们的司令、政委。王秀珍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给张、李封官许愿，同时鼓动一些人死心塌地跟着张、李垒山头，搞宗派，分裂军队，分裂警备区党委。马、徐、王还在延安西路某号等地方，搞了许多类似的非组织活动。

他们搞阴谋诡计的另一个手段，就是策动一些人告黑状。近年来，警备区一些人给“四人帮”和马、徐、王写诬告信、告黑状的特别多。仅据一个师的不完全的统计，就有五十多封，达十万多字。现在真相大白了，原来根子就是“四人帮”和马、徐、王。他们或者是加以暗示，或者是公开指使，在他们的唆使下，于是有的人到处写信，到处告状，捏造事实，妄加罪名，陷害好人，打击意见不同的同志。严重地损害了部队内部的团结，弄得人人自危，各存戒心。更为恶劣的是，他们陷害了这些同志还不够，还要栽赃到我们领导的头上，说什么“问题在

下面，根子在上面”，归罪于什么“路线不正”，要我们承担责任。“四人帮”和马、徐、王甚至对警备区主要领导同志的秘书进行“策反”，充当他们的“探子”，监视领导同志的行动，经常向马、徐、王“汇报”。可见他们的用心是多么恶毒。

他们搞阴谋诡计还有一个手段，就是倒打一耙。例如，今年二月份，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我们原来打算由李宝奇同志代表警备区在大会上发言，稿子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说，这次不搞单位代表发言了，你们有个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不错嘛，就让他讲吧。我们照他们的意见办了。可是，后来马、徐、王却造谣说，这样一个会，警备区领导不愿发言，却叫下面的一个人发言，这是对“批邓”的态度问题。他们这种造谣污蔑、倒打一耙的做法，实在太卑鄙了！“四人帮”为了整南京军区，把军区部队搞乱，还胡说什么南京军区“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马、徐、王听到这个黑话以后，马上心领神会，看出了这是整人民解放军的一根很粗的大棒，于是也跟在后面狂喊乱叫，要我们承认警备区也是“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这是对我军大好形势的诬蔑，是对全区广大指战员的攻击。实际上，他们说的所谓“歪风邪气”，正是广大指战员对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加以抵制的革命行动。

恩格斯说：“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从“四人帮”以及马、徐、王对我们警备区采取的种种卑鄙手段，不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卑鄙目的吗？

（八）他们炮制“军内走资派”的反动理论，妄图毁我长城

大家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关、戚一伙，搞了一个“军内走资派”的反动谬论，到处揪“军内一小撮”，把许多军区搞乱了。是

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粉碎了他们“毁我长城”的罪恶阴谋。可是今年夏天，这股阴风又从“四人帮”和马、徐、王那里刮出来了。有一次，徐景贤窜到某团三连，胡扯什么研究军内资产阶级的問題，“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对于今后长远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要大家都来研究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大阴谋。广大干部、战士及时识破了这一点。当时有不少同志提出，“这和王、关、戚的黑话有什么两样？”“这样搞不是要把部队搞乱吗？”可是警备区的张、李、杨，却把他们的黑话当作“圣旨”，到处吹捧，胡说什么“市委领导同志的讲话很深刻”，引起了部队的思想混乱。一些奇谈怪论就出来了。什么“军内走资派比党内走资派更危险呀！”什么“军区×××就是军内走资派呀！”什么“警备区×××也是军内走资派呀！”甚至影射警备区领导的描写所谓军内走资派的小说《命运》和剧本也出笼了，把一些单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引向了邪路。试问，你们说的研究军内资产阶级问题，“具有极大的尖锐性”，这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你们说的“今后长远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矛头又是指向谁？

同志们，“四人帮”尤其是张春桥、王洪文，是压在警备区头上的两个恶霸，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紧跟“四人帮”，在警备区也干尽了坏事。这几年，我们警备区的干部、战士，真是挨不完的大棒，戴不尽的大帽，深受其害，吃尽苦头。他们为什么对警备区那么恨，为什么多年来对警备区一整再整？从“四人帮”下面这段话里就可以找到答案。王、张、江、姚等人，不止一次忧心忡忡地说过：“我们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我最担心的是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寥寥数语，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妄图篡夺军权的狼子野心。他们为了篡党夺权，必然要反军、乱军，篡夺军权。他们想把警备区拉过去，没有拉到手，就打、就压、就进行分裂。这次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就是

他们长期以来篡党夺权罪恶阴谋的总暴露。他们就是妄想靠他们的“手令”指挥和调动警备区的部队。但是，撼山易，撼解放军难。警备区的广大指战员决不是“四人帮”以及马、徐、王所能拉得动、压得服、整得垮的。现在，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被粉碎了，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一定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在南京军区党委和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和全市广大革命人民一起，把“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揭深批透，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全面加强部队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本文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在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揭发批判“四人帮”搞“第二武装”，大整人民武装部的反革命罪行

徐汇区人武部

搞“第二武装”，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和市民兵指挥部的坏头头李彬山、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等人，为了篡党夺权，把黑手伸向民兵。他们打着“改造民兵”的黑旗，拼命把民兵“改造”成为与解放军相对立的“第二武装”，“改造”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为此，他们反军乱军，大整人武部、警备区和军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整我们徐汇区人民武装部，是相当突出的。对于他们犯下的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

早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张春桥就伪造了一个所谓毛主席关于“民兵改造”的指示，接过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对上海民兵强行“重建”和“改造”。他们“改造”民兵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改造”传统的民兵领导体制，用民兵指挥部代替武装部，不准武装部做民兵工作，夺取了民兵的指挥权、领导权。王洪文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的干将们：“把我们这支队伍建设好，就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这个队伍不要被人指挥”。他们这种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分裂统一的武装力量体制的做法，遭到了广大人武干部的抵制和反对。

大家都很清楚，民兵是在党绝对领导下的群众武装组织，是“三结合”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为了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加强我国“三结合”武装力量的统一建设，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党中央、中央军委

委一再重申：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就是各级地方党委的军事部。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领导和指挥民兵。“四人帮”、马、徐、王和市指挥部的坏头头，出于搞“第二武装”的反革命需要，只要谁对他们那一套提出一点不同看法，就使尽种种卑鄙伎俩大整特整、大反特反。

一九七二年，上海警备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民兵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力量。我区人民武装部遵照上海警备区党委和区委的指示，及当年《解放军报》六月十九日社论精神，派了一名部长、两名副部长和一名副政委，加强了民兵工作的领导力量。对此，王洪文和马、徐、王及李彬山、钟定栋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和控制民兵大权的阴谋，极为恼火，一直在窥测方向，伺机下手，除去这个“心病”。

一九七三年，他们抛出张春桥的“请示”和王洪文的黑信，唆使一些喽罗围剿警备区和十个区武装部，同时，到处搜集炮弹，妄图从几个区打开缺口。王洪文拿到徐汇区民兵指挥部某些人写的一个歪曲事实真相的小报告，又听取市民兵指挥部坏头头所谓徐汇区人武部有个副部长不支持上海民兵“新生事物”的汇报，就大放厥词，大作文章，胡说什么“这个区总有个歪风邪气在那里作怪”。他亲自写黑批示，下令要狠狠整徐汇区人民武装部。主子一声令下，奴才摇旗呐喊，“四人帮”安插在市地区组的那个亲信，立即赶来坐镇。这样，整徐汇区人民武装部的丑剧就开演了。“四人帮”的那个亲信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棍子，胡说什么人民武装部的领导干部主持民兵工作是“反夺权”，专职武装干部做民兵工作是“反改造”。大叫大嚷要揭所谓“夺权反夺权”，“改造反改造”的矛盾，例如，区委领导同志根据群众反映，责成在指挥部工作的一位副政委找指挥部一个头头谈话，就这一件

事，被说成是什么“排挤打击工人新干部”；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当时感到指挥部关押的人太多，设想把有些案子商量交给公检法。并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天津监狱的一个批示，抓了一下指挥部随意抓人、关人、打人的问题，对此，被污蔑为“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取消民兵抓阶级斗争”，还公然宣称“打得对”，“打得好”，“民兵的威信就是打出来的”。甚至可笑地提出什么在徐汇区人武部有一条“崔王路线”(部长姓崔，副部长姓王)。他们不但整人武部的领导同志，还整人武部的一般干部，对专职武装干部也不放过。上海量具刀具厂和区烟糖公司的两个专职武装干部在区指挥部工作，对他们整人武部的做法不赞成，结果这两位同志也连同人武部同志一起被赶出民兵指挥部。“四人帮”、马、徐、王等这一伙的恶劣行径，引起徐汇区民兵指挥部的地方同志和军队同志的无比气愤，大家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四人帮”搞三箭齐发，反军乱军，区委里的那个亲信伙同王洪文“小兄弟”、徐汇区的土霸王周妙兴，在马、徐、王和市指挥部坏头头的指使和支持下，他们一不批林，二不批孔，把斗争矛头又一次指向解放军，刮起了一股大整人武部和警备区的妖风。他们认为人武部的主要领导是他们篡夺民兵领导权的障碍之一，于是，就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不择手段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要大揪特揪所谓“徐汇区复辟倒退，扼杀新生事物的总后台”，大会小会数十次，整了达一年之久。市民兵指挥部的李彬山、周宏宝、钟定栋等坏头头，接过王秀珍“民兵批林批孔，不要空对空，要联系实际”的黑指示，为了把民兵的指挥权、装备权、经费权等统统夺过来，进一步巩固他们那个“第二武装”，在市民兵指挥部和另一个区指挥部策划了两张所谓“革命”的大字报，矛头直指警备区和南京军区。他们把这两张大字报转发到各区点火放炮，把整人武部的火进一步煽起来。他们胡说军区、

警备区不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犯了什么“方向路线错误”，对徐汇区工作有很大影响等等。看，他们上下呼应，紧密配合得多么合拍。马、徐、王还直接指使人把一九七三年九月已调去某师工作的一位原部长，在一九七四年五月揪回来批斗。王洪文的“小兄弟”周妙兴等人制造了一个“为林彪死党造微型冲锋枪”的爆炸性政治谣言，对这个原部长加以迫害。一直整到一九七五年二月才被放回部队。另一位人武部副部长抓民兵工作八个月，但停职检查却有一年多。还有一位领导同志兼任区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仅四个月，因为不合他们的胃口，就被剥夺了领导权。

区委的那个亲信和王洪文的“小兄弟”周妙兴，在大整人武部的同时乘机为自己翻案，对人武部进行政治陷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土霸王周妙兴为毁尸灭迹案被公安机关逮捕。在王洪文、叶昌明的包庇下，不仅被放了出来，而且仍然得到重用。当时，人武部对此事并不知情。但周妙兴等人大肆散布人武部“是镇压徐汇区工人运动的罪魁祸首”，人武部支左“是搞特务活动”，造谣污蔑，无中生有，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必欲把人武部领导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竟动用专政工具把人武部的两位同志带到公安局进行批斗；对关押罪犯重新提审，进行诱供；还强令人武部集中办学习班，进行追查，妄图搞出他们所需要的“镇压工人运动，反对王洪文”的材料。其用心是极其险恶的。他们这种贼喊捉贼的做法，当时就遭到了人武部同志的抵制。

自此以后，“四人帮”和上海一小撮余党及市民兵指挥部的李、施、吴、钟等人经常以所谓“搞正路线”为名整人武部，稍不如他们意，就给你扣上“路线不正”，“不支持新生事物”的大帽子，进行迫害打击。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反党分子王洪文窜到上海，听取了市指挥部坏头

头的汇报，觉得徐汇区人武部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说徐汇区是市委所在地，十分重要，又下令整徐汇区人武部。十月三日，施尚英在传达王洪文的黑指示时，气势汹汹地点了徐汇区的名。紧接着派人来徐汇区办学习班，要人武部的同志继续“搞正路线”，最后同上两次一样，又赶走人武部的一名副部长和一名副政委才罢休。“四人帮”搞“第二武装”，反军乱军，大整人武部，我们深受其害。几年来，共有五名部领导、两名正副科长被剥夺了领导和参加民兵工作的权利。这个恶果，罪魁祸首是“四人帮”，责任在马徐王和市指挥部一小撮坏头头。

“四人帮”和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及李、施、吴、钟等人，为什么长期抓住其他区和我们区人武部不放，一整再整？问题很清楚，他们要整垮的不是一、两个区人武部，他们是要另立民兵指挥机构，经营“第二武装”，直接控制和指挥民兵，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和市民兵指挥部的坏头头刺探到“四人帮”已被打烂时，就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妄图利用民兵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矛头直指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把徐汇区作为重点区，对区民兵指挥部也作了周密布置，钟定栋亲自交代任务，还派出了联络员坐镇指挥。“四人帮”搞“第二武装”，反军乱军，篡党夺权，违背党心、军心、民心，到头来只能“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落得个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选自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上海民兵、人防系统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的发言材料）

“三位一体”是“四人帮”篡党夺权、搞“第二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自动化仪表三厂民兵营

长期以来，“四人帮”苦心经营“第二武装”，妄图使上海民兵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武装力量。“三位一体”，就是他们搞“第二武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位一体”最早是由野心家王洪文提出来的，就是把基层单位原有的人民武装、治保、消防硬捏在一起，以民兵取代基层的专政机构，以达到他们独揽大权的目的。王洪文这个阴谋一出笼，“四人帮”和上海的一小撮余党，便百般美化、竭力宣扬，说“三位一体”是“民兵建设上的一场革命”，是“新生事物”，是“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的好形式”，是“在斗争中改造民兵、建设民兵的重要措施”，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产物，要从国家实质和职能上来认识”，等等，真是什么漂亮的外衣都穿上去了。但是，广大基层单位实在是认识不到“三位一体”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对“四人帮”的这个“新鲜经验”是不感兴趣的，许多单位是抵制的。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三位一体”的所谓“新鲜经验”，并没有得到多大推广。有的单位，虽然名义上实行“三位一体”，实际上还是三位三体。反党分子王洪文，这个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理论上更是一窍不通的家伙，也知道自己手里的这个蹩脚货色卖不出去，便到处声嘶力竭兜售说：“三位一体，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我当过治保主任，也搞过消防，搞过民兵，当过保卫干部，我知道嘛，三者结合起来有什么不好……。你们

要抓一个区、一个县总结点经验。”“从理论上、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主子这样拼命叫卖，马、徐、王更加忙碌起来。他们窜到基层，到处游说，又是抓点、又是召开现场会，一次又一次地发“指示”。马天水更是不遗余力地亲自到基层调查，拼命鼓吹说：“××厂、××厂‘三位一体’确实搞得好。要把‘三位一体’搞得更好，我们的战斗力就大大增强，适应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适应形势要求。”市指挥部的一些坏头头李彬山、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等人，在推销“三位一体”的黑货时，也十分卖力，他们用定指标、限时间的办法，对基层实施高压政策，说什么“实行不实行‘三位一体’是个路线问题，是前进还是倒退、复辟和反复辟的问题”，强行推广。在“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又是兜售、又是高压政策下，至去年八月，全市的基层单位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单位都实行了“三位一体”，真是流毒全市，危害极大。所以尽管象我们这样只有六百多人的工厂，既非他们抓的点，也不是区里的先进单位，可是也深受其害。大家可以从一斑见全貌，完全可以看出“三位一体”在全市所造成的恶果了。

毛主席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两年的工作实践中，“三位一体”这个形式在我们厂造成的种种恶果是极为严重的。

（一）“三位一体”破坏了基层的保卫工作

毛主席曾经亲自肯定了基层的治保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可是“四人帮”和上海的一小撮余党把矛头直指毛主席，攻击治保委员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只限于少数人，并疯狂地叫嚷“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不能靠少数人。”胡说“治保委员会过时了，治保委员会只是少数人，缺乏群众性。”于是就有人提出什么“全厂有多少个民兵，就有多少个治保员，多少个消防员。”以此取代治保组织，一口吞掉治保委员会。自从

实行“三位一体”后，基层中一些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一定对敌斗争经验的老工人治保员，由于身体条件和年龄限制不能参加民兵而被一脚踢出保卫工作岗位，使工厂的保卫工作失去了一支可靠的骨干力量。一些是民兵的治保员也由于“所有民兵都是治保员”，所以实际上也被取消了。我们厂原来从厂到车间、小组都建立了健全的治保组织，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被冲垮了，结果下面的情况反映不上来，治保工作贯彻不下去。如我厂有一个劳改释放分子在小组中搞非法活动，因为大家都是治保员，大家都不管，无人向上反映，使这个劳改释放分子得以长期逍遥法外。由于“三位一体”违背基层实践经验而受到下面的抵制，我厂有的车间就采取了对原来治保组织明散暗不散的办法，表面上没有治保组织，实际上还是照原来传统在活动着。这些车间治保情况反映得迅速及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查清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些车间部门治保组织散了的，情况不但上不来，反而有抵触情绪，工作很难开展。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多少个民兵就是多少个治保员，完全是形而上学的主观臆造，别有用心！

“四人帮”破坏保卫工作，破坏公安工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就背着毛主席，胡说什么要“砸烂公检法”，攻击公检法是反动的公检法。张春桥也恶毒地讲什么现在的国家机器要彻底砸烂，另起炉灶。这是多么反动，他完全否定了十七年来公安工作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与毛主席关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基层的指示大唱反调，为“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复辟势力、地富反坏、流氓阿飞分子大开绿灯。我们联系这些事实，就不难理解“四人帮”推行“三位一体”，破坏基层治保工作的险恶用心。

（二）“三位一体”破坏了基层消防工作

以防为主，以消为辅，群众与专业相结合方针，是我国几十年消防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四人帮”别有用心地以形而上学的观点全盘否定这一方针，他们反对基层有专职消防队伍，甚至连业余的消防队伍也不许成立。他们叫嚷“民兵都是消防员”，一心要用民兵取代消防专业队伍。从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很相信民兵，很相信群众，因而似乎是很革命的，但实际上民兵是人民军队的有力助手和强大的后备军，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如果从主观空想出发，我们的民兵，既能生产，又会打仗，又会消防，又能搞保卫，还能破案，这似乎是很理想的。并且按“四人帮”及其余党随心所欲还可以幻想下去，我们的民兵会打机枪，又会驾驶坦克，又会开汽车，又会开雷达，又会驾驶飞机，还能开军舰。但这仅仅是幻想，就象拉着自己的耳朵想离开地球一样脱离实际。毛主席曾经讲过：“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由于“四人帮”是野心家，祸国殃民，所以他们就是要这样的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胡说八道。他们妄图用民兵组织代替治保组织，也代替消防组织，结果是破坏了治保工作，也破坏了消防工作。民兵是群众的武装组织，担负着繁重的生产任务，它的传统是劳武结合，所以民兵的活动应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平时一般不能过多地占用生产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既要进行军事训练，又要进行消防训练，还要进行保卫知识训练，样样都来，结果是蜻蜓点水，什么也搞不成，到头来是专业消防队伍取消了，群众消防也搞不成。如果“四人帮”得逞，那就只能形成他们狼子野心所需要的民兵“万能”了！象我们厂原来有支业余消防队，“三位一体”建立后，我们虽然也

组织过两次脱产的消防训练，但受训人数只占整个民兵人数的百分之五，而且这百分之五的民兵也还不是所有的人都学会了二十二匹手操泵的使用，有的连发动机也拉不出，如果全厂的民兵都要这样训练一遍，要训到何年何月呢？并且民兵中体力有差别，年龄有差别，男女有差别，情况有变化，怎么可能都担任消防工作呢？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消防工作中的群众队伍和专业队伍是互为左右手，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四人帮”推行“三位一体”只是空洞的群众消防的漂亮话，削弱、否定专业消防，实际上也就同时削弱、取消了群众消防。

（三）“三位一体”也破坏了民兵建设

“三位一体”取代了基层治保组织，取代了消防组织，也取代了基层民兵工作的部门——人民武装部，从而破坏了基层民兵建设。基层人武部是毛主席一贯强调，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再重申的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和指挥民兵基层工作的派出部门。过去他们在上级军事部门和同级地方党委双重领导下，在贯彻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加强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四人帮”及其上海一小撮余党马、徐、王，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下令专职武装干部停止活动，摘掉武装部的牌子，停止武装部的工作，直到推行“三位一体”取消基层武装部的机构，完全砍断了军事系统同基层民兵的联系，完全破坏了我国民兵工作的传统体制，篡改了民兵工作方向，破坏了民兵建设。

“四人帮”吹嘘的“三位一体”，主观唯心别有用心地夸大了民兵作用，结果破坏了毛主席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的民兵工作，搞乱了民兵和各个方面的关系。“四人帮”妄图用民兵取代一切，结果造成大

量调用民兵。记得一九七六年“五一”劳动节放假一天中，我厂民兵总人数才三百多，调动执勤的却达到一百五十人以上。平时其他执勤任务的压力也很大，造成民兵本身负担过重，执勤人数一多，就大大影响到厂内生产出勤率，大大干扰了抓革命，促生产，也造成武保干部与车间干部的矛盾，车间里一看到武保组来人，就摇着头讲“又来抽人了”。毛主席指出：民兵组织“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民兵执勤、执行一定的任务而适当占用一定生产时间是完全必要的，过去这样，现在这样，今后还将这样。但必须发挥民兵这一劳动组织的作用，发挥民兵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带头突击作用，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加强民兵建设。“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妄图利用“三位一体”这个骗人的组织形式，用上海民兵取代一切，就是明目张胆地篡改民兵的性质和任务，肆意破坏民兵建设，搞“第二武装”。

“四人帮”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但正如马克思揭露巴枯宁时所讲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四人帮”就是一伙搞阴谋勾当的老手。他们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逼着基层要建立“三位一体”呢？“四人帮”及其上海一小撮余党马、徐、王把“三位一体”鼓吹起来以后，苦心经营，竭力控制，他们凌驾一切，超越工厂企业单位党组织的领导，直接插手与控制基层保卫、消防、直接指挥与调动民兵，妄想把上面的和基层的专政工具都牢牢地抓在他们手里，为他们反党乱军、篡党夺权建立“第二武装”扫障碍，打基础。马、徐、王曾经说过：只要基层“三位一体”了，上面就好解决了。他们确是这样做的。当基层实行“三位一体”，架空了区人武部和公安分局后，他们接着就在区、县着手人武部和民兵指挥部

搞两部合并试点,吃掉人武部,再吃掉人防办等。他们以“党委一元化领导”为名,排斥军事系统的领导。同时扬言要成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以建立“四人帮”的“一统天下。”从这里就可清楚地看出,“四人帮”搞“三位一体”是一个阴谋,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法西斯专政服务的。“四人帮”及其余党马、徐、王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就是“四人帮”在民兵问题上罪恶活动的一次恶性总发作,也是他们推行“三位一体”、搞“第二武装”这一卑鄙目的总暴露。虽然他们苦心经营了多年,但由于他们搞的是修正主义,是不得人心的。尽管他们张牙舞爪,杀气腾腾,向无产阶级扑来,但是他们和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头子和反动派一样,得到的只能是可耻的下场。

(选自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上海民兵、人防系统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的发言材料)

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利用旅社民兵为“稳住上海,搞乱外地,乱中夺权”反革命方针服务的罪行

静安区服务公司旅社中心店民兵连

近几年来,我们静安区旅社民兵连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重视抓好治安保卫工作,既当服务员,又当战斗员,又是宣传员,配合专政机关先后破获大小案件三百余起,狠狠打击了混入旅客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和各种犯罪分子,保障了广大工农兵旅客的安全。同时,我们还根据行业特点,向旅客宣传中央有关文件,组织广大旅客学习和投入各项政治运动,把我们的服务工作不断推向前进。“四人帮”余党马、徐、王以及市指挥部坏头头,认为有机可趁,便把黑手伸进来,肆意歪曲、践踏我们民兵工作的经验,硬给贴上是“民兵改造”的“新生事物”、“新鲜经验”的标签。马天水出于反革命需要,对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旅社就作过四次黑批示,又是要我们在全市万人大会上介绍,又是登报、广播,还先后要我们接待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数十批民兵代表团的所谓参观学习。他们一方面盗用民兵和群众做出的成绩,竭力为“四人帮”的“第二武装”装璜门面;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散布“你们要想得深一点,远一点,只抓那些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要看到“主要危险是走资派”等蛊惑人心的谬论,要把我们民兵工作强行纳入他们的轨道,妄图把我们旅社民兵变成“四人帮”推行“稳住上海,搞乱外地,乱中夺权”十二字反革命方针的御用工具。

以前，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四人帮”和马、徐、王以及市指挥部坏头头的罪恶阴谋活动看不清楚，在他们的高压和欺骗下，也多次作过所谓经验介绍。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全连民兵掀起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高潮，对“四人帮”破坏民兵建设的罪行，感到无比痛恨。今天，我们要彻底揭发批判马天水和市指挥部坏头头插手我们民兵工作所犯下的一系列严重罪行和险恶用心。

第一，利用旅社收集各地政治动态，打击迫害

对“四人帮”不满的革命旅客

我们旅社行业，旅客来自四面八方，具有人多面广，消息灵通的特点。马天水等人出于反革命的目的，千方百计利用旅社刺探和搜集全国各地政治动向，为“四人帮”插手外地，搞乱外地，乱中取利，乱中夺权提供情报。每当国内一有重大政治事件，他们总是派人到我们旅社收集旅客的动态、反映。特别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人帮”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另搞一套，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马徐王积极配合，南北呼应。他们以所谓“反谣追谣”为名，强令我们民兵要对广大旅客实行政治监视。坏头头钟定栋布置说：“你们旅社民兵要掌握外地旅客的一举一动，一发现动向，立即报告”。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们更是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我们民兵到各个旅社进行突击清查，对旅客搞突然袭击，一发现有对“四人帮”不满或对上海运动持不同看法的旅客，就以抓阶级斗争为名，进行打击迫害。

由于“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马、徐、王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公开插手外地运动，早就引起了兄弟省市广大群众的愤慨。去年四月初，浙江绍兴一位旅客，对上海运动另搞一套非常不满，他说：“马天水在一次讲话中乱点外省名，是搞阴

谋诡计。”说完，他就结了帐，气愤地提前走了。这件事被“四人帮”的爪牙知道后，下令要立即追查，还恶狠狠地说什么：“外地旅客既然到上海，我们有责任提高他们的认识。”他们的所谓“提高认识”，说穿了就是要借我们民兵之手整革命旅客。一次，一位从江苏淮安来的旅客因对“四人帮”不满，讽刺地说：“上海就是好，中央要靠上海呀，现在政治局里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上海人。”这一情况惊动了“四人帮”的亲信和黑爪牙，命令要对这一类所谓“攻击性”的言论，不能轻易放过，要严加追查，严肃处理，把文章做足。又有一次，一位来自贵州的采购员，出于对周总理的真诚热爱，对“四人帮”的强烈愤恨，说外地群众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时的那种丑态，十分愤慨，还说了周总理逝世我伤心，毛主席健在我放心，“四个现代化”搞不上去我担心等。“四人帮”的爪牙知道后，却兴师动众，大做文章。“四人帮”和马、徐、王安插在静安区的亲信钱永年亲自批示：“立即追查，报告区委”。并责令连夜对这位旅客进行审查，要他老实交代问题，一直搞到深夜十二点多钟。眼看搞不出名堂，就要他写检查交代，并勒令他在第二天上午到区民兵指挥部报到。结果，吓得这位旅客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一早，被迫到指挥部送了书面检查后，连行李也没敢拿就跑回贵州。“四人帮”的爪牙把一位革命旅客吓跑了，还污蔑人家认错态度不好，逃之夭夭了。接着，区里又马上发函到这位旅客单位，要他们严肃处理。这件事既破坏了我们社会主义旅社的服务方针，更严重影响了上海与外地的团结。马天水在《解放日报》反映这一情况的一期简报上批示说：“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思想工作作得好。”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哪一个阶级的“纲”？这是在做政治思想工作吗？不，这是对一个革命同志疯狂的政治迫害，是对外地革命旅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难怪有些旅客尖锐地

指出：“你们这样做，不是坏人怕民兵，而是好人怕民兵了！”

第二，炮制所谓抓“主攻方向”的经验，不择手段要 在外地旅客中揪“走资派”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为了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仅在一九七六年上半年，他就连续三次在市财贸组、市指挥部、《解放日报》内部情况或简报上反映我们旅社民兵组织外地旅客学习的材料上下达黑批示，还一再催促要“认真总结”、“推广”。特别是去年六月十七日下午，他带着秘书，在市指挥部坏头头施尚英、钟定栋、吴立义的陪同下，前呼后拥，窜到了我们中心店民兵连，闭口不谈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和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却胡说什么旅社民兵“与党内走资派斗争是重点，是我们抓阶级斗争最重要的方面”。当时，马天水明知在全市“六·一九”纪念大会上静安区旅社的发言，却还装腔作势地问“有没有发言”？市指挥部坏头头告诉他发言稿已定稿了。马问：发多长时间？答：十五分钟左右。马天水连忙说：“可以讲得长一些，不要限制时间，要敞开来讲，讲得具体些。”

“醉翁之意不在酒”。马天水的险恶用心，市指挥部坏头头是心领神会的。他们连夜派人重写了我们的发言稿，发言时间从十五分钟加长到半小时以上。发言内容中，凡有外地旅客说上海市委好话的，统统要摆进去；凡涉及反映外地运动搞得不好的情况，原来不点名，准备一句带过的，都要直接点名，对江苏、浙江、江西、贵州等地大加丑化，并攻击说那些地方的运动所以搞不好，根子在那里的“走资派”。恩格斯说：“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马天水一伙借我们基层民兵组织之口，把矛头指向外地，攻击外地的革命领导同志，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

揭了吗？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马天水听着这篇完全是由他授意炮制的发言稿，得意洋洋，眉飞色舞。最后，他在讲话中，还离开了原来准备好的稿子，对他自己炮制的杰作，自我欣赏地大大赞扬了一番，又再次趁机放毒，说什么：“静安区旅社民兵工作走出了一条新路子。是共产主义思想挂帅的结果。如果靠岗位责任制是办不到的”等等，事实很清楚，不是我们旅社民兵走出了什么新路子，而是“四人帮”及马徐王妄图把上海民兵纳入到篡党夺权的罪恶道路上去。

就在这次大会上，马天水还居心叵测地要市指挥部坏头头进一步总结、推广旅社民兵的所谓经验。主子一声令下，市指挥部坏头头紧紧跟上。于是，钟定栋立即带着一帮人马，撇开我们公司党委和中心店党支部，来到我们民兵连蹲点，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一步歪曲、践踏了我们旅社民兵和职工结合本职抓阶级斗争的基本做法，精心炮制了一份题为《努力把旅社办成与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阵地》的所谓经验，大谈民兵的主攻方向是党内走资派。他们为了要揪走资派，由市民兵指挥部、市革会财贸组、地区组三个部门出面，在七月下旬又召开了静安区民兵结合本职抓阶级斗争的现场交流会，把这份由钟定栋按照马天水旨意直接炮制出来所谓揪走资派的黑“经验”，强行在全市服务行业推广，流毒全市。

令人更气愤的是，在炮制这份“经验”的过程中，钟定栋为了紧密配合“四人帮”和马徐王“搞乱外地，乱中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演出了一场在旅客中找“走资派”的丑剧。钟定栋为了要炮制一份“旅社民兵结合本职抓阶级斗争的主攻方向是党内资产阶级”的黑经验，因为在我们提供的材料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他再三提出要挖这方面的材料，十分露骨地说什么最好揪县委书记以上的，实在没有，找出个大队支部书记也好，硬逼着我们民兵连的一个干部

对十六家旅社逐个打电话问。当回答说没有时，再一家一家旅社上门去找，结果仍然找不到。怎么办呢？就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法，“造”了一个出来。当时，有一位旅客是江西某县革委会的副主任，是个老干部，他在一次读报时说，干部与群众要“划等号”，我还没有听到过，是你们上海提出来的吧？这个情况被钟定栋知道后，如获至宝，便硬塞进那份“主攻方向”是揪走资派的所谓经验中去，要把那位老干部当作“民主派”、“走资派”的典型来揪了。由于旅社民兵和职工的坚决抵制，才没有真正被作为“走资派”揪。

第三，拉关系，滚雪球，妄图把所谓民兵经验 流毒全市，影响全国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在利用旅社民兵对敢于揭露和批判他们的革命旅客实行政治迫害和当作走资派来揪的经验的同时，还削尖脑袋在旅客中物色可以利用的对象，拼命拉关系，搞串联，相互吹捧，为搞“第二武装”，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去年六、七月间，清华大学有十几位工农兵学员来沪开门办学，住在愚园路招待所。钟定栋得知后，亲自坐车前来拜访，动员“启发”他们写发言稿吹捧上海民兵。后来这批学员已经结束在上海的实习任务，硬要叫他们留下一人，直至在全市民兵大会上发言后才让他回去。钟定栋为了讨好“四人帮”在清华的死党，硬要学员把发言稿寄去请他审阅。最后由“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一个亲信亲自修改定稿。在修改稿中，他们肉麻地吹捧上海民兵揪走资派的经验新就新在哪里哪里，好就好在什么地方，比原稿长了一倍！他们远在北京，又没到我们旅社来过看过，却闭着眼睛大谈对这个所谓“新生事物”的心得体会，岂不滑天下之大稽？但这样一添一加，却正中钟定栋下怀，钟不仅要他们在这次现场

会上发言，而且还印发全市，大肆宣扬。这个学员临走，钟定栋还特地前去送行，并要他带口信给“四人帮”在清华的死党，表示感谢。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利用外省、市民兵代表团来沪参观之机，一面大力兜售所谓上海民兵经验，一面又加紧拉拢关系，抱成一团。去年七、八月份，“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专门派了民兵参观团来上海“取经”，钟定栋接到马徐王“要好好接待辽宁贵客”的黑指示，亲自布置，亲自迎接。一见面就相互吹捧，钟定栋说什么：辽宁“三位一体”搞得真好呀，“批邓”跑在前呀，我们两省市关系一直不错呀等等，还无耻地吹捧“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辽宁的代表也竭力恭维上海民兵经验在不断发展，民兵揪走资派是什么“新生事物”、“新鲜经验”呀，回去要照样搞呀等等，就这样拉拉扯扯，吹吹捧捧，南北呼应，结帮篡党夺权。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以及市指挥部几个坏头头还企图把他们炮制的旅社民兵的“经验”，用“滚雪球”的办法推向全市，影响全国。他们不惜功本，开动宣传机器，在静安区大搞六个“一”，什么一套经验，一份报告，一本书，一张表，一台戏，一组画，主题都要突出揪走资派。但是尽管他们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却在我们中心店旅客中始终没有揪出一个符合他们胃口的“走资派”来。马天水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他嫌我们小旅社揪不出大走资派，就策划召开“静安区现场会议”，责令上海六大饭店的民兵到会参加，还点名向黄浦区施加压力，要他们向静安区学习，妄图煽动大饭店、大旅社的民兵，在外地旅客中揪大的“走资派”，达到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的罪恶目的，用心何其毒也！

（选自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上海民兵、人防系统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的发言材料）

“四人帮”及其爪牙要民兵“立法、管法、执法”是个大阴谋

中共红色线厂总支委员会

“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余党，为了使民兵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不仅制造民兵与军队的对立，篡改民兵的性质、任务，还妄图用民兵取代其他专政工具。过去，我厂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民兵、武装民兵、建设民兵，曾荣获上海警备区授予的“集体三等功”和南京军区授予的“民兵标兵连队”的光荣称号。一九七四年，市民兵指挥部一小撮坏头头，假惺惺地对我们说：“你们红色线厂民兵是先进单位，在全市有一定影响，要有新的发展创造，不能停留在介绍学习马列、用基本路线教育民兵的经验上，老是介绍这方面，比较空，一定要有新的发展，新的经验。”真是一派胡言，他们要的所谓“新发展”是什么呢？就是要借我厂这块“宝地”办所谓“劳动教育学习班”，并竭力鼓吹民兵不仅要“执法”，还要“立法”、“管法”。这个“劳动教育学习班”，一切都由市指挥部坏头头直接控制、掌管。“四人帮”要民兵“立法、管法、执法”，就是妄图要民兵掌管一切，取代一切，把所有的国家机器都统到“四人帮”手里，变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实行法西斯专政，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对“四人帮”及其爪牙要民兵“立法、管法、执法”的大阴谋，我们必须彻底揭露，罪行必须彻底清算，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一、“四人帮”打着要民兵“立法”的幌子，就是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法制

市指挥部在我厂办的“劳动教育学习班”搞了一段时间后，“四人帮”的余党马天水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窜来我厂后，就到处吹嘘我厂的“劳动教育学习班”办得好，并在他的黑批示中说这“是工人阶级用马列主义占领法律阵地”。市指挥部几个坏头头也先后窜到我们厂里来，大造反革命舆论。钟定栋恣意攻击无产阶级法制，明目张胆地说什么：“我们民兵现在光是执法，是不够的。解放后，我们还没有真正成文的法律，苏联有成文的法律，我们没有。因此，我们自己要立法，立法后还要管法”。他们为了要立“四人帮”的“帮法”，还提出我们要“建立民兵理论小组，着重研究法律”，以便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这不是十分明显的吗？毛主席指出：“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建国以来，由毛主席亲自批准，党中央审定，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五四年”第一部宪法，“七五年”第二部宪法，以及“惩治反革命条例”、“治安条例”等一系列无产阶级法制，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意志，代表了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和巨大的作用。无产阶级的法制明摆着，可是，“四人帮”及其余党、爪牙，却千方百计要加以否定，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法是有阶级属性的。“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市指挥部一小撮坏头头，如此肆无忌惮地攻击、否定无产阶级法制，就是为了要炮制他们的那一套“帮法”。他们出于反党夺权的需要，也立了许多“帮法”，规定民兵可以任意抓人、关人、留置、冲击等等，制定了各种“条例”、“规

定”，甚至他们说句话都可以成为“法律”。一次，我厂有位同志去市指挥部汇报工作，坏头头钟定栋就作了一条规定：“凡在学习班关过的人，‘户口’在你们这里，出去重犯，不要通过啥人，就可以把她重新抓进来。”他们的一句话、每条规定，都成了“法律”，就可以随便捕人、关人。他们不仅无视无产阶级法制，而且还随心所欲地歪曲、篡改宪法。一九七五年第二部宪法颁布后，我厂干部和广大民兵通过学习“新宪法”，提出民兵这样办“学习班”对不对？民兵不通过专政机关抓人、关人，符合不符合宪法规定？当王秀珍知道后，气急败坏地说什么：“最近，对民兵抓人有不同看法，你们不要自己怀疑自己，自己否定自己”。市指挥部一小撮坏头头也跟着大叫大嚷，说什么：“宪法只规定逮捕、拘留要有专政机关执行，没有讲冲击，冲击不等于逮捕、拘留”。这就给民兵抓人留了余地。他们随心所欲地解释、歪曲新宪法，为“四人帮”的“帮法”服务，简直狂妄到了极点。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各省、市、自治区只能根据宪法精神搞一些章程、条例、办法等，而且还必须报中央批准后才能实施，地方是没有立法权的，何况是民兵，更是没有立法的权力。“四人帮”要民兵“立法”，这不是把民兵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提并论了吗？岂非咄咄怪事。说怪也不怪，“四人帮”要民兵“立法”，其阴谋就是在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作准备。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镇压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就有了现存的“帮法”。这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二、“四人帮”打着要民兵“管法”的幌子，就是妄图用他们的那套“帮法”强加于无产阶级专政机关

毛主席指出：“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手里的一把刀子。”又说：“我们

现在的任务是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解放以来，党中央、毛主席一直非常关心公安、司法工作，亲自为公安、司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公安、司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四人帮”把公安、司法等专政机关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他们就打着要民兵“管法”的幌子，把“四人帮”的“帮法”强加于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他们为了达到这个反革命的罪恶目的，大肆造谣诬蔑，对专政机关加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江青曾狂妄叫嚷“砸烂反动的公检法”。马、徐、王以及市指挥部一小撮坏头头心领神会，紧紧跟上，在大小会议上到处吹嘘说，红色线厂劳动教育学习班总结了“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法律阵地”的经验，“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途径”。他们把这经验作为炮弹，到处向专政机关投掷，还借基层单位之口，大肆攻击公安局、法院等专政机关，全盘否定他们的作用。一九七五年上半年，施尚英摆出“太上皇”的架势，设下圈套，叫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来我厂“学习取经”。钟定栋还特地关照我们“要好好讲，他们老框框多，要教育教育这些老干部”。他们还要我们到法院召开的区、县以上的法院庭长会议上去发言，并事先定了调子，作了黑指示，要我们“放开大胆讲”，“提法越尖锐越好”，还胡说什么“劳动教育学习班”是“体现了群众专政”，“是工人阶级占领法律阵地的一条新路子”；攻击和丑化公安局破案是“靠三个头”：“狗头（警犬），镜头（照相机），指头（手印）”，执行的是神秘主义关门办案路线，是苏修的“格伯乌”那一套。他们还诬蔑公安部门执法是“年龄不满十八，行凶没有刺死，偷窃不满二十（元），流飞不算犯法”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咒骂公安、

法院办案是“保卫组打报告，公安局戴手铐，人民法院贴布告，广大群众看热闹”的少数人办案。还要我们总结和介绍所谓怎样批判以往办案中那种“重材料、轻表现，重判处、轻改造”的修正主义倾向，怎样冲破所谓“事实是依据，法律是准绳”的“旧框框”等经验，猖狂地要公安局、法院也按照“四人帮”的“帮法”那一套去做。真是反动透顶！我们的发言结束后，市指挥部坏头头高兴得手舞足蹈，钟定栋连声称赞“红色的发言尖锐、泼辣、有力，这一炮开得好！”真是竭尽造谣、诽谤之能事，这帮家伙恨不得一口吃掉公安局、法院等专政机关，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可是事后，他们又作贼心虚，生怕露出狐狸尾巴，忧心忡忡地对我们说：“以后你们对外介绍要注意，不要太明显，提法再推敲、推敲”等等，完全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为了进一步污蔑、贬低、否定公安局、法院等专政机关，马、徐、王和市指挥部一小撮坏头头还授意“文汇报”别有用心地搞了一篇题为《一墙之隔，路线之分》的内部情况，表扬他们在我厂的“劳动教育学习班”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路线正确”，“创造了新鲜经验”，而把我厂隔壁的某某厂，一个由公安局办的“学习班”骂得一无是处。马天水还借这份材料大做文章，训斥公安局“路线不正”。一时，攻击污蔑公安局、法院等专政机关作用的丑剧紧锣密鼓，越演越烈，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是何等的急迫啊！

三、“四人帮”打着要民兵“执法”的幌子，就是妄图用民兵取代公安、法院等专政机关

毛主席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从劳动教育学习班这些女流飞的罪行来看，必

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对于这些犯罪分子的抓、关和处理，都必须由人民的公安、人民的法庭这些国家机关去执行。宪法二十八条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民兵是群众武装组织，是无权抓人、关人的。可是，“四人帮”及其余党、爪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无视无产阶级的法制，恣意篡改民兵的性质、任务，竭力鼓吹民兵不仅要“立法、管法”，还要“执法”。他们打着要民兵“执法”的幌子，就可以随意抓人、关人、审讯、定案。市指挥部一小撮坏头头还胡说什么：“我们的权是经过斗争夺来的，是不容易的。”“对这些女流飞，公安局不抓，我们抓，他们管不好，我们民兵来管。”处心积虑地要民兵“执法”，取代其他专政工具。钟定栋还直言不讳地对我们说：“劳动教育学习班要有‘独立性’，不能是‘寄放站’，办案要以自己为主，否则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权要被人家夺过去的。”他们为了取代公安机关，赋予劳动教育学习班的权力之大，简直与公安局、法院不相上下。原来劳动教育“学习班”外调介绍信要到公安局转，从去年七月开始，市指挥部一小撮坏头头明确规定，不要去公安局转介绍信了，然后有个区指挥部就发给我们一本空白介绍信，让学习班自己外出调查、审讯，就这样从抓人到结案，完全自搞一套，自成体系，取代了专政机关。

不仅如此，市指挥部一小撮坏头头为了进一步取代公安局、法院等专政机关，还要我们处处撇开公安局、法院。许多民兵认为搞好这项管教工作，一定要和专政机关结合起来，有些案子还向专政机关作了汇报。市指挥部一小撮坏头头知道后，却指责我们“为什么要向他们汇报，和他们一起搞？”对于公安局关押的女流飞要放到我厂劳动教育学习班来，市指挥部坏头头百般刁难、横加指责，不予同意。有些大案子，一旦有了线索，他们就再三叮嘱“要保密，千万不能被公安局

知道，不要被他们搞去。”更令人气愤的是，有些案子法院已作了判决，市指挥部坏头头也叫我们“顶”，任意改变法院的判决。例如对一个罪犯，有关厂党委意见和法院的判决是“戴坏分子帽子，回原单位监督劳动”，并准备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当众宣布。市指挥部一小撮坏头头就指使我们“不要怕嘛，要敢于顶！”周宏宝当时还说：“既然意见不统一，就慢慢再讲嘛！”因此，当有关厂党委拿了法院判决书来领人去批斗时，他们就坚持不放人，放肆地破坏无产阶级法制，把民兵完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了！而他们对犯罪分子要关就关，要放就放。有的罪犯，法院认为至少要判十年徒刑的，他们恣意强调态度、表现，从宽处理，任意包庇，怂恿了坏人。在他们这一伙人眼里，那里还有党，还有政府，什么人民的公安、人民的法庭等国家机关，统统不要了，不必存在了。对于他们搞的这一套，当时我们搞管教工作的民兵也想不通、弄不懂、看不惯，认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为啥公安局、法院和民兵指挥部要分得这么清？我们有不满情绪，市指挥部坏头头就挥舞“民兵抓阶级斗争是新生事物”的大棒，随心所欲地打过来。现在真相大白了，“四人帮”的余党及爪牙，恣意篡改民兵的无产阶级性质、任务，打着要民兵“执法”、“立法”、“管法”的幌子，擅自动用民兵抓人、关人、办案、定案，就是妄图要把民兵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御用工具，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

“四人帮”为了加快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还把我厂“劳动教育学习班”作为一个窗口，向全市、全国推广他们的黑经验。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直接策划下，全国有几十个省、市代表团来我厂“参观、学习取经”，妄图把他们炮制的黑经验从一个厂滚到全市，从城市滚到农村，从一地滚到全国，最终用民兵取代其它专政工具，

控制一切，统治一切，实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选自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上海民兵、人防系统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的发言材料）

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插手 上海站联合办公室进行篡党 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

上海铁路分局民兵师

毛主席说：“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下面，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和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等把黑手伸到我们上海站“联合办公室”所犯下的罪行。

大家知道，上海站“联办”，是在每年春节运输期间，为了维护上海站革命秩序，保障铁路运输畅通，由公安、民兵和车站附近有关单位参加所组成的维护上海站秩序的临时班子。可是，就是这样的联合办公室，“四人帮”及其余党也无孔不入、不肯放过，长期来，一直被“四人帮”的黑干将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等控制着。他们打着“关心上海站安全”、“关心铁路畅通”的幌子，大搞分裂活动，排斥公安，打击异己，自成系统，另搞一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上海站这个消息灵通的门户，刺探情报，收集黑材料，镇压革命群众，大搞阴谋活动。这就充分说明：他们关心铁路是假，搞阴谋诡计是真；抓阶级斗争是幌子，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是实质。对于他们在上海站“联办”搞的阴谋活动和犯下的大量罪行，必须彻底揭发批判。

一、把持联合办公室，大搞分裂活动

铁路历来是两个阶级争夺的重要部门。张春桥是很懂得这一点

的，他多次讲：“铁路是必争之地，一定要控制好。”“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心领神会，都把铁路看作一块肥肉，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把黑手一只一只的伸进来。不仅马、徐、王亲自出动，频繁地出入于铁路系统，而且受他们控制的市委和市革委会的许多部门，都蜂涌而至。紧跟“四人帮”的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等当然不甘落后，也把黑手向铁路分局伸来。他们趁整顿上海站秩序领导小组和“联办”组成的机会，钻进了这个领导小组和“联办”。他们不择手段地抬高自己，打击公安，分裂民兵与公安的关系，妄图用民兵取代公安，同时还分裂铁路分局与铁路局，用分局代替路局，以控制车站这个交通枢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几年来，他们在“联办”大搞以市指挥部为主。本来，维护车站秩序以公安为主，民兵协同，配合公安，这是个好传统。开始，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两家密切配合，团结战斗，搞得很好。可是，钟定栋等人就是看不惯，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的黑手插进来以后，用“四人帮”的霸道作风，对别人动不动就戴帽子、打棍子，他们打着批王维国的幌子，打击公安，拿“新生事物”压公安，使公安抬不起头来。而同时又把自己吹上了天。说什么“联合办公室是靠民兵撑腰，民兵一调就是几万，公安能调几个人？”“没有公安，民兵也能干。”由于钟定栋等人的破坏，维护车站秩序，名义上联合，实际上以他为主。在整顿车站秩序的领导小组里，他们成了太上皇，没有市指挥部头头的同意，领导小组召开不了会议；在会上市指挥部头头不讲话，公安的同志不敢先表态；没有市指挥部头头点头，问题就不能决定，一手控制了“联办”的领导权。在分局和路局之间，他们也制造分裂。铁路局是分局的上级领导，可是，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等人却不顾这一事实，硬要“联办”不听铁路局的，要跟着他们跑，如果不这样，他们就

以不给上海站调民兵相威胁，真是狂妄到了极点。一九七五年底，铁路局革委会对一九七六年春节期间上海站的治安保卫力量，提出了一个设想，考虑到民兵是生产骨干，打算少用民兵，多派部队和民警，这个想法本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民兵的性质和任务的。但钟定栋等人知道后，却怒火万丈，大骂铁路局是什么“思想回潮”，“扼杀新生事物”，“反对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等等，还别有用心地说：“兵力问题，他们不给，指挥部给，上海站需要多少，你们就报多少，不受限制，要对着干。”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们又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躲在后面扣帽子，打棍子，搞小动作。他们害怕路局管联合办公室，自己丢了权，失了施展阴谋的阵地。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施尚英、钟定栋等人所以疯狂地分裂民兵与公安、分局与路局的关系，排挤路局和公安在联办的领导地位，就是妄想把“联办”变成他们搞阴谋的工具。去年一月份，南京市公安局发来紧急通缉，要求上海协助缉拿三个外逃的重大凶杀嫌疑犯。当时，市公安局一位处长亲自到“联办”，要求派民兵配合。“联办”向市指挥部请示。可是，市指挥部竟以要批准为理由，不准动用民兵。“联办”的同志对市指挥部这种不顾大局，蛮横刁难的卑劣作法，十分气愤。大家认为，打击阶级敌人，是民兵义不容辞的责任，敌情就是命令，市指挥部不批准，我们就自己组织民兵积极配合公安，在当天南京开往上海的六五五次列车上，先后把这三个通缉的对象准确无误地查获。南京公安机关对此十分感激。当这件事传开以后，市指挥部又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催促“联办”整理上报材料，向马、徐、王请功领赏，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两个字。

一九七五年，钟定栋等人又秉承“四人帮”一伙关于民兵要把治安工作“管起来”、把公安工作“统起来”的反动旨意，打着民兵工作要

“创新”、要“发展”的旗号，鼓吹民兵单独干，自己搞“抓、关、审”。我们曾多次向他们表示过不同意见。钟定栋等人不但不予考虑，反而训斥我们：“你们这几年光吃老本，没有发展，没有创新，不能停止不前，眼光要放远一点，要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由于民兵和公安分开办案，确实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迟迟没有按他们的主张办。钟定栋等人对此大为恼火，赤膊上阵，亲自动手，强令我们跟着他们干。一九七六年一月，在一次会上，钟定栋的联络员提出，要把民兵小分队的牌子打出去。为这块牌子的名称，钟定栋绞尽脑汁，想来想去，几经反复，亲自给定为“上海民兵火车站小分队”，他还说什么：“这个名称是经过反复考虑才定下来的，它不但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而且在大量用兵的时候也可以用，今后调来的民兵，就由这个小分队管”。为挂这块牌子问题，他们又别有用心地制造分裂。我们把民兵的牌子和公安派出所的牌子挂在一起。钟定栋的联络员知道后，大发脾气，说什么：“搞来搞去你们还是弄到一起，这样做，要给公安吃掉的。”我们不得不把小分队的值班室同派出所分开，但牌子还挂在派出所的门口。我们认为这样总可以了吧。哪知，他们又不同意，说：“不能这样干，挂在一起总不好。”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搞得我们无所适从。

与此同时，钟定栋等人为了单独干，又在办案问题上大作文章。还是在那一次会议上，他的联络员提出，要把民兵从同公安合办的办案组里分出来，要自己搞。说：“只有这样干，民兵才独立得起来。”对这件事，他们三番五次的催促，由于我们的反对，长期未能分成。一九七六年五月份，根据本站治安比较稳定的情况，决定“联办”工作暂时收缩。这时，钟定栋等人认为机会已到，竟不顾公安部门的反对，强令办案组停办，撤销办案组，使车站打击、处理现行犯罪分子发生

了困难。公安部门强烈要求恢复办案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露出真意，说什么“不撤销你们是分不开来的。办案组可以上马，但一定要分开办。”七月份，钟定栋和他的联络员来车站接待外宾时特地找了我们分局党委的一个负责人，密谋策划单独成立民兵办案组。以后，他们又不断催促，在这种情况下，于八月份，我们才不得不分开办。分开后，果然两家在办案问题上矛盾尖锐，关系紧张，这是钟定栋等人一手造成的。不少同志说：这样做，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加强，而是削弱、破坏。钟定栋搞分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罪责难逃。

二、利用联合办公室的合法阵地收集情报，

大搞阴谋活动

“四人帮”及其余党所以要如此丧心病狂地把“联办”的领导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完全是出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需要。每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越是尖锐复杂的时候，他们对“联办”的控制就越是严密，活动就越是频繁。去年以来，特别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等人，三令五申地要“联办”关心“大事”，要抓“国内国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动向。”胡说什么：“民兵光抓小偷有啥意思，只不过是经济问题，要注意政治问题。”“你们要把情况抓起来，发现情况要立即向指挥部报告”等等。因为我们反映适合他们口味的情况少，多次被训斥，批评我们“政治上敏感性太差，不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他们这样做的用意十分险恶，就是要通过上海站这个门户，收集各地情况，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不久，施尚英突然窜到“联办”，要我们汇报情况，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又把“联办”的同志叫到市指挥部，由他的联络员布置任务，说什么：“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火车站是阶级斗争的

温度表，要组织力量抓‘敌情’。”“要收集总理逝世后的反映，要收集社会上的‘谣言’”（指对“四人帮”的不满言论）。还说什么：“只有这样，才能进行预测。”他们要预测什么呢？施尚英窜到“联办”，正是“四人帮”及马、徐、王一伙阴谋策划、刮起了一股要张春桥当总理的阴风的时候。当时，广大革命人民中间对这个野心家妄想篡党夺权充满了愤恨，早已民怨沸腾，众怒难犯。施尚英一伙所谓要预测，就是要用特务手段来窥探革命群众的情绪和动向，并加以控制，为“四人帮”一伙策划张春桥当总理提供情报。为了达到这个卑鄙的目的，他们还特别交待我们：“要组织便衣民兵到旅客当中去，听听他们讲些什么，这样才能收到真实的情况。”还要“发动乘务人员在旅途中了解旅客有些什么反映，要在一个车班试一试。”并十分狡猾地布置：“人员不要太多，要路线斗争觉悟高的。”“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这些卑劣手段，与国民党的特务、警察有什么两样呢？对于这些“任务”，我们无法理解，认为不必要，没有完全照他们的意图去做，对此，他们大为不满。

三、控制联合办公室，搞所谓“敌情监视”，

镇压与“四人帮”作斗争的革命群众

去年三月五日的《文汇报》反周总理事件，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纷纷起来斗争，猛烈地冲击了“四人帮”。广大革命群众的言论和行动，打在“四人帮”身上，痛在奴才们心里。钟定栋得知火车站发生的情况，在四月一日那天，伙同市公安局的×××慌慌张张地赶到“联办”，一面恶毒地攻击污蔑革命群众的斗争，一面声嘶力竭地要摆开架势展开“反击”。他们擅自决定组织民兵分兵把口，控制车站。他还丧心病狂地下令，对于北方来的旅客，要严密注视，发现可疑的人员，要严加查询，决不能漏掉一个；对于列车上的所谓“反动

标语”(指对“四人帮”的),要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洗刷,决不能让它流入市内。对于讲反对“中央首长”的话,贴反对“中央首长”的标语(指对“四人帮”的)的人,要毫不手软,马上抓起来,甚至对刷悼念周总理的大幅标语,对悼念周总理的话都不允许,也要追查清楚。这种疯狂的法西斯手段,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钟定栋为了保护“四人帮”,这时候完全抛掉了遮羞布,赤膊上阵,什么组织原则,什么党纪国法,统统都不要了,“四人帮”就是“党”,保护“四人帮”就是“法”。钟定栋为了控制上海北站的指挥权,还责令“联办”要二十四小时监视“敌情”,同市指挥部保持密切联系,发现“敌情”,立即报告。在钟定栋的亲自指挥下,一时间,上海站闹得旅客们人心惶惶。有一次,杭州来的一个火车司机对上海另搞一套非常不满,在北站红厦门讲了几句反对马天水的的话,市指挥部的头头们得知后,要“联办”想法把那个司机找到,查清来源。弄得那个司机很紧张。事后还要打电话到那个司机的单位,要对他严肃处理。以上事实说明,他们所谓监视“敌情”,监视的是革命群众,保护的是“四人帮”,搞的是资产阶级专政。

总之,只要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一伙就要把黑手伸到“联办”,或亲自出马,或派联络员,为“四人帮”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窥测方向,刺探情报,出谋划策,充当打手,干了大量祸国殃民的反革命罪恶勾当。

他们在上海站“联办”犯下的罪行,只是他们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侧面,但这个侧面就很足以说明他们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是何等的一致,配合得是何等的密切;他们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是多么的亲,对坚持革命路线的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多么的恨。“四人帮”如果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我们就要吃二

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上海民兵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选自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上海民兵、人防系统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的发言材料)

揭发批判“四人帮”及马徐王策划 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

原市民兵指挥部工作人员 马关根

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四人帮”落网后，他们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声嘶力竭地狂叫要与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血战到底”。这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建国以来所没有，建党建军以来所罕见。随着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深入开展，大量事实证明，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一、依托篡党夺权基地，使用武力对抗中央

毛主席指出：“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去年十月六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两个阶级生死搏斗的紧急关头，采取英明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四人帮”刚一落网，他们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民兵指挥部的坏头头李彬山、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等一伙，凭着他们反革命的政治嗅觉，预感末日来临，立即凶相毕露，背着上海人民，妄图依托上海这块“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利用他们苦心经营的“第二武装”，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公然以武力对抗党中央、对抗华主席。在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中，“四人帮”的余党，王洪文的一帮小兄弟，市民兵指挥部的一小撮坏头头，是死

心塌地的、疯狂的、拼命干的。这里，我们仅从他们策划的两个黑会、下达的两个手令、炮制的两个作战方案，就可以看出这帮家伙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

两个垂死挣扎的黑会：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与“四人帮”联系中断，派往北京的密探从电话里发来暗号后，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经过白天密谋策划后，阴谋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手段进行垂死挣扎。那天深夜，王秀珍怀揣徐景贤的手令，带了一帮政治流氓王洪文的小兄弟、黑干将，窜到民兵指挥部，召开了一次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黑会。在会上，这伙亡命之徒叫嚷：“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了”，“可能宫廷政变了”，“把三个领导扣下来了（指王、张、姚）”，“我们地方要起来造反”，“要准备独立作战”，“上海民兵一切行动听从市委指挥”等等。这个黑会以后，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等人连夜通知召开所谓“加强战备”的紧急会议，用欺骗的手法，把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兵力部署到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迈出了阴谋利用民兵搞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第一步。

十月十二日晚上，当他们确切地知道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后，又召开了一次黑会。这帮家伙象赌徒输红了眼睛，在会上起哄，决心孤注一掷，“血战到底”。他们撕掉了一切面纱，狂叫什么“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千，要马上干！”“我们的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要立即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阻止江、浙两省军队进入上海，夺取电台，广播宣言和告全国人民书。”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两个猖狂一跳的手令：“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一开始，就兵分三路，一路由徐景贤带领，抓笔杆子，搞反

革命舆论；一路由王秀珍带领，抓枪杆子；一路由张敬标负责，留守市委机关。分手前，徐景贤给民兵下了第一道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指挥部的坏头头根据徐景贤的手令，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了第一、第二梯队的武装叛乱兵力，还强调要人员、车辆配套，枪弹配套，真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九日凌晨，徐景贤又给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写了一个手令：“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电台第一把手）同志的指挥。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两个手令，调兵遣将，彻底暴露了他们搞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疯狂性和反动性。

两个负隅顽抗的作战方案：我们从市民兵指挥部坏头头李彬山、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等人炮制的两个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作战方案，更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妄图要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血战到底的计划性和目的性。

九日凌晨，王秀珍在市民兵指挥部策划了第一个黑会后，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等人心领神会，立即组织力量，炮制了第一个作战方案：规定了“四位数”、“五位数”的兵力分配；确定了基本指挥点和预备指挥点；选择了派往各区的联络员；以及弹药补给、通讯保障、联络暗号等等，想得确是周到。随后，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等人身佩手枪、匕首，携带了大量机密文件和黑材料，一头扎进黑据点准备去指挥反革命武装叛乱去了。

十二日深夜，也就是根据第二次黑会“各路各方要积极准备好干”的结论，钟定栋在基本指挥点里，亲自在一张彩色的上海地图上，这里画个圈，那里划条线，重新炮制了代号“捍一”、“方二”的最后负隅顽抗的反革命作战方案。这个方案有六大内容，即重点目标保卫，

枪弹补给，区、师指挥核心形成，口令标记，通讯联络、以及从郊区到市区的三道包围圈和六个封锁口的设置，进一步增添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兵力。钟定栋凶相毕露地说：“十年心血在于此。”很清楚，所谓“十年心血在于此”，就是垂死挣扎罢了。他们还设想，一旦阴谋失败，用笨重的机械设置路障，封锁机场，炸沉万吨轮封锁航道。施尚英、钟定栋等人不仅炮制了准备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血战到底”的作战方案，还表了豁出命来干的决心。并决定十三日到各区去吹风，妄图把上海民兵死死地绑在他们反革命战车上。在他们的煽动下，有些区的个别喽罗就起哄，有的发出了“虹兵第一号战斗命令”，叫嚷“要上山打游击”，并腾出班房，准备把反对他们的人进行关押；有的直言不讳地叫嚣“要血战到底”；“一支枪、一粒子弹也不交出来”，并下令“把机枪架到四楼屋顶上去，一有情况就好扫”；有的给摩托连装备了十挺机枪、十枝冲锋枪，配备了六千二百发子弹，并压上了子弹，在这些地区疯狂“巡逻”；有的直至十三日晚上，还下令一个基层单位的民兵“带武器弹药，车辆要加满油，做好行动准备”；有的一直到十五日还继续发放武器和弹药，猖狂已极，真是令人发指。此时此刻，他们一心想，“威赫赫，爵禄高登”，那知是，“昏惨惨，黄泉路近”。

二、欺上瞒下组织退却，妄图伺机东山再起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和喽罗们密谋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真是迫在眉睫，危在旦夕。党中央一声号令，广大群众和上海民兵奋起响应，立即行动，一枪未响，一滴血未流，就解决了问题，避免了一场内战。

“四人帮”已经垮台，他们经营的“第二武装”已经彻底破产，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粉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但是，马、徐、王、李、施、吴、钟等一伙蠢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

还死死抱成一团，欺上瞒下，阴谋组织退却，订立攻守同盟，进行合法斗争，妄想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马、徐、王在中央参加打招呼会时，假惺惺地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假表态。回沪后，不仅先找帮兄弟、黑干将搞串连、定口径，轻描淡写地说什么“这次战备，我们已向中央报告了。”还借转弯子为名，行吹捧“四人帮”、攻击党中央华主席之实。马、徐、王为了继续欺骗党中央，欺骗上海一千万人民，于十四日下午，别有用心地派了报社的一个亲信，来到上海民兵指挥部，紧急组织了一篇《上海民兵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的上海民兵指挥部署名的文章，强令上海两报于十五日同时刊登，妄图掩人耳目，洗刷罪责。

指挥部的坏头头，吃了马、徐、王的定心丸，在十四日下午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时，一个个哭丧着脸，拉开了低沉的调子，也“鹦鹉学舌”地趁谈思想演变过程为名，继续为“四人帮”唱挽歌，影射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仅如此，他们还公然下令第一指挥点上的工作人员仍要去值班，要联络员继续到各区掌握情况，并一再声称指挥班子不能撤。当民兵指挥部革命群众和广大民兵指战员，坚决站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奋起造了他们的反，揭露他们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滔天罪行时，施尚英恶狠狠地说：“这个问题市委领导已向中央讲清楚了，我们没有搞什么阴谋。”还威胁群众说：“你们头脑要冷静，这里面有些具体情况。”继续负隅顽抗。到十八日，他们一伙才被追交出手枪和匕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竟然利用党中央的耐心等待，利用党的政策宽大，一面私自销毁黑材料，一面搞攻守同盟。九日下午，王秀珍打电话给施尚英，要他把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兵力“保留四位数，撤掉五位数”。施尚英对钟定栋说：“现在情况还很复杂，看一看情况再说，队伍慢点撤，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战备还是要加

强。”在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后，施对钟说：“这个问题绝对不能讲。”钟说：“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出卖你的。”从此，他们就矢口否认王秀珍打过这个电话。直到去年十二月中旬，上海警备区召开的民兵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会议上，施尚英、钟定栋还一再抵赖，拒不承认。他们的反动立场，顽固劲头，昭然若揭。李、施、吴、钟等人，甚至到处放空气，制造假象，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受蒙蔽的。有的还挤下几滴鳄鱼的眼泪，来欺骗群众。钟定栋还装腔作势地说：“我这次上当了。”但就是这个钟定栋，一直把准备杀人的几种凶器，如棍子、手杖匕首等私藏在办公室和宿舍。直至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清查时才陆续交出来。可见，他们在继续负隅顽抗，蒙混过关，潜伏下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顽固派顽而不固，攻守同盟，总会被攻破。他们这些跳梁小丑，是几只碰壁的苍蝇，嗡嗡叫，到头来只是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三、苦心经营“第二武装”，发动叛乱蓄谋已久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策划的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蓄谋已久的。这虽然是“四人帮”落网后的垂死挣扎，但却是“四人帮”长期苦心经营的必然产物。“四人帮”蓄意破坏我国统一的武装力量体制，搞一支与人民解放军相对立的“第二武装”，另立“第二武装”司令部，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过：这“不是一个随便什么形式的问题，而是根据整个战略来改变和确定形式的。”用武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就是“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整个战略”。

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狼子野心，拼命抓枪杆子，把黑手伸向军队，伸向民兵，军队抓不到，就拼命地抓民兵。在政治上，他们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改造民兵、改变民兵的性质、任务；组织上，他们结帮营私，

以帮划线，安插亲信，排己异斥；军事上，他们加紧进行军事训练；物质上，他们造枪造炮，大肆扩充武装实力；在干部培训上搞民兵军政干校。特别是在毛主席一再地严厉批判了“四人帮”之后，他们更加紧了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各项准备。一九七五年九月，王洪文窜来上海，对马、徐、王和民兵指挥部的坏头头说：“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你们要作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能站得住。”他们叫嚷要加强战备观念，要民兵搞班、排、连、营的进攻、防御等战术训练，包括城市巷战、丘陵地带和开阔地带的战术训练，还要上海民兵学会指挥等等，给“四人帮”的余党“打招呼”，“发信号”。王洪文还多次向马、徐、王等交代：“要尽快把上海民兵武装起来”，“民兵武器要抓紧制造，抓紧分配，抓紧装备”，“一旦有事好用。”马、徐、王及李、施、吴、钟对此卖力大干。他们不仅背着党中央毛主席，明目张胆地上海擅自搞了一些军火工厂，造枪、造炮。据统计，三年来，就花去三千二百多万元资金，私造武器达四万余件。他们还以釜底抽薪的手法撇开军委和总部，把国家军工生产计划之内的枪弹，谎称是“增产”部分，擅自购买下来，作为一旦叛乱时用，仅私购武器这一项，在一九七四年底一次就动用了地方经费一百八十二万元，购买了步枪近一千五百支，枪弹近四百万发。一九七六年，他们又动用地方经费二千零五十万元购买枪支弹药。此外，他们用了近百万元的费用，非法建造了一艘配有高射机枪、电台、雷达等仪器的巡逻快艇。为了有步骤地扩大他们的反革命武装，“四人帮”还炮制了一个狂妄的上海民兵武器装备发展的十年规划，要给上海民兵装备数十万件武器。而十年规划的第一年，即一九七五年，武器累计已达规划的44%。在这个规划中，他们不仅要搞什么各种现代化的火炮，“摩托化师”，“水陆坦克师”，还要造什么“微型冲锋枪”，什么打巷战用

的自动步枪，搞间谍活动的“打火机手枪”等等。这真是不惜一切代价加快他们用武力篡党夺权的准备。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去年六月，马天水、王秀珍等就催促民兵指挥部把全部武器发下去，到八月初，马天水发现还未落实，就露出一副狰狞面目疯狂叫嚷民兵武器“要立即下发，明天就要发”。于是他们在八月份就匆匆忙忙下发了七万三千多支步枪，二百挺机枪，三百门八二迫击炮。在毛主席逝世后第二天，仅二十个小时中，又突击发了子弹六百多万发、炮弹一万五千发。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一九七三年起，一再叫嚷要民兵指挥部研究上海民兵的所谓“作战方案”。仅一九七六年，从周总理逝世的一月到毛主席逝世的九月，李、施、吴、钟丧心病狂地拟制“战备方案”达四次之多。这些所谓战备方案的作战对象，既不是苏修，也不是美帝，而是空在纸上，放在心上。为了使反革命武装叛乱计划付诸实施，他们还多次召开紧急战备会议，多次把成千上万的民兵全付武装拉出来，进行战备演习，甚至搞了一次矛头直接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秘密“战备”。这次公然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把矛头指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彻底暴露了他们蓄谋已久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和他们在上海的余党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上海军民早就有所察觉，上海民兵早就有所警惕，有的单位，有的同志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一经揭露，我们上海百万民兵奋起造“四人帮”的反，纷纷揭发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四人帮”及其余党终究逃脱不了他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可耻下场。

（选自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上海民兵、人防系统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

揭发批判“四人帮”策划反革命武装 叛乱在虹口区的罪行

虹口区人武部

上面已有同志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及其余党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现在我们着重揭发、批判他们在我区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滔天罪行。

毛主席指出：“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不甘心失败，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妄图以武力对抗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市指挥部坏头头李彬山、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等人秉承他们的旨意，频繁活动，通过在我区的那个干将，掀起一阵阵反革命鼓噪，演出了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丑剧，犯下了滔天罪行。虹口区是他们的所谓“放心区”、“安全区”，所以他们在虹口区就更加肆无忌惮，放手大干，请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吧！

仓惶部署 疯狂顽抗

去年十月九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刚播送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市指挥部坏头头施尚英、吴立义等人就紧急召开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头头的“紧急会议”，会上谎称“加强战备”，实质上是部署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区原指挥部的那个干将一回来，就背着领导小组，独断专行，又是开会布置，又是研究策划，物色人选，建立了一个十

一人的所谓“战备检查小组”，下设指挥联络、情况宣传、后勤装备三个小组。吴立义等人说的黑话。什么“这次战备，部队与民兵各不相干，互不搭界，部队归部队，民兵管民兵。”什么“这次战备可以不向区委汇报。”他一个字不讲，却给大家规定这次所谓战备只限于参加的人知道，甚至各小组之间都不能互相联系，互通情况，更不得向指挥部其他同志泄漏一个字。当天下午，就召开了四十二个单位民兵负责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布置所谓“战备”。会上规定了第一、第二梯队的应急兵力，还怕完不成任务，于是又把第一梯队兵力由二百四十名扩大到三百二十名，第二梯队兵力由一千二百名扩大到一千四百七十五名，并增加了第三梯队，兵力为五百一十五名。紧急下发了二十七万六千六百发子弹，动用了六三式自动步枪一千一百八十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千零九十二支，特地从青浦把一部正在训练的十五瓦电台紧急抽回，当晚六时，即与市指挥部设在江南厂的黑指挥点沟通了联络，此外，还规定三部二瓦报话机、十余辆摩托车应急待命，杀气腾腾。但这些活动，连指挥部机关大部分正副组长、党支部委员都不知道。接着，他们又炮制了一个所谓保卫市指挥部、保卫区指挥部、保卫区革委会的所谓“三保卫”计划。这个“三保卫”计划，连绘图的人都感到不明确，别人看不懂，那个干将却直言不讳地说：“我就是要人家看不懂，只要我自己心中有数就行了。”好一个“心中有数”！不打自招地泄露了祸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矛头究竟指向谁，他们是“心中有数”的，是完全清楚的。

“吹风”打气 加快步伐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在确切知道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后，他们惊恐万状，要破釜沉舟，

作垂死挣扎。施尚英急急忙忙要区里的基本指挥点，加快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步伐，派人到各区去“吹风”，“稳定军心”。钟定栋不仅左一个电话，右一个口信，要那个干将“有病也要躺在指挥部”，而且窜来我区，面授机宜，煽动叛乱。

钟定栋一走，我区又是领导小组会议，又是战备小组会议，急急忙忙检查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准备，还召开街道民兵小分队负责人会议，进行反革命“吹风”。当天晚上就向十四个单位发出了所谓“虹兵第一号战斗命令”，搞了由五百八十七名民兵参加的全副武装的所谓“一级战备紧急集合”，实际上是一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预演。他们从弹药仓库取出二万七千发步枪弹，二千五百发手枪弹，三百枚手榴弹，偷偷运进指挥部机关；指挥部机关人员同时发枪发弹，配备了全自动步枪八十四支，冲锋枪十支，轻机枪一挺，手枪二十支。正副组长每人一式两大件，一支全自动步枪，一支手枪。一时间箭拔弩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他们连“一号命令”上写的苏修、蒋帮这一作战对象也要划掉。诡称什么“现在的敌人是四面八方来”。然而欺骗是难以持久的。他们向下去参加这次预演的联络员交待任务时终于露了马脚，他们说：“你们不要提保卫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提保卫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中央”，这是什么话？一语道出了他们的反革命心声！他们的所谓“战备”，矛头直指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真是罪该万死！这还不算，在演习结束时，那个干将得意洋洋地说：“我有五百多个兵力，可以上山打游击了”。看！反党分子王洪文不是说过“准备上山打游击”吗？他也“要上山打游击”，唱的是一个调子，走的是一个路子，这和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等人准备出逃如出一辙，充分暴露了他们与人民为敌，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本质。直到十月十三日，马、徐、王已经从北京回来，而在我

区的那个干将，还同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电话联系，要把这场反革命武装叛乱继续下去，真是反动透顶。

逐步升级 愈演愈烈

十四日，反革命武装叛乱在我们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天上午，那个干将召开了指挥部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会议，继续大肆进行反革命煽动，要大家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声嘶力竭地说：“这是对我们每个同志严峻考验的时候了。”他当场宣布指挥部机关进入“战备”，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准外出，回厂劳动和外出人员，要立即叫回集中待命，妄图把大家死死的绑在他们的反革命战车上，为“四人帮”当炮灰。为了控制机关和防止外来人员了解他们的情况，他规定外来人员，包括市区机关领导和基层单位民兵干部来机关联系工作的，都要由专人负责接待，然后再由他确定能否进入机关。他还背着领导小组、战备小组和机关工作人员，秘密从两个单位增调四十五名全副武装民兵（三十名在工厂待命）封锁、控制区指挥部机关，指定专人进入秘密指挥点，秘密安排人员监视、搜集指挥部机关人员的动态，用单线联系的方法，直接向秘密指挥点专人汇报。另外，还腾出一间监房，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不言而喻的是法西斯专政。同时，还组织了十一人到有武器弹药的单位进行检查，再三强调施尚英、钟定栋等人的黑指示，规定没有指挥部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调动兵力和动用一枪一弹。这充分说明，反革命武装叛乱，在我区已经准备就绪，太有一触即发之势，他们妄想大干一场，决一死战。反革命的气焰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

不甘失败 伺机反扑

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四人帮”及其余党都是一批色厉内荏的反动派。所以，当党中央和华主席的决定已经同群众见面，他们的阴谋一被揭露，就迅即垮台了；然而反动的阶级立场，又总是驱使他们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当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后，在我区的那个干将不顾同志们再三劝阻，在十五日上午召开了所谓“加强战备”单位的经验交流会，会上他蛊惑人心地叫嚷：“这次战备是根据军委指示搞的决没有错”，并表扬一些单位，批评了一些单位，布置原来作为第一梯队的四个单位，继续加强战备值班。区指挥部训练组同志准备刷出“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大幅标语，他竭力阻止，说什么“我们是专政机关，不要点名，也不要提打倒，一点名、一提打倒也就定性了。”当市有关部门通知我区立即释放因骂江青而被关押的对象时，他又拒不执行，说：“还要等一等”，拖了两天才放。甚至他还在私下惋惜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未搞成功，说：“这次要是马老（指马天水）顶一顶，我们就上了；马老没顶，我们也就瘫掉了”。并且丧心病狂地说，“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看一、二年”。十分清楚，“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余党对他们的彻底失败是决不会甘心的，时时妄图反扑。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同他们坚决斗争，决不手软。

以上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表明，“四人帮”及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用心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妄图以武力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党和国家就会大分裂、大倒退，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上海一千万人民就会陷入“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深渊之中。以华主席为首的党

中央采取了英明果断的措施，“四人帮”及其余党阴谋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来不及开一枪、扔一弹，就土崩瓦解了，遭到了最可耻的失败。同一切反动势力灭亡前垂死挣扎的结果一样，“四人帮”及其余党也在猖狂一跳中覆灭了，真是大快人心。

（选自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上海民兵、人防系统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

揭发“四人帮”为武装叛乱大搞 物资准备的反革命罪行

上海市财政局党委书记 陈捷

长期以来，“四人帮”背着党中央，背着上海人民，搞了许多反党阴谋活动，妄图把上海作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阵地。直到他们行将覆灭的时候，还妄图负隅顽抗，进行垂死挣扎，阴谋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从我们财贸系统广大干部和群众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来看，“四人帮”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是蓄谋已久的。他们利用社会主义财贸阵地，已从财力、物力上作了大量准备。这些准备都不是战备的正常需要，而是直接为其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服务的。现在，我代表财贸系统参加会议的同志进行揭发。

一、动用地方经费，为反革命武装叛乱加紧私造、私购大量武器。

对于民兵的装备，根据战备要求，总参每年都订有民兵装备计划，由财政部拨给上海一定数量的装备费。但是，“四人帮”千方百计地破坏民兵建设，妄图把上海民兵变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反党分子王洪文多次叫嚣上海民兵要“自己武装自己”。他每次窜来上海总是叫嚷：“民兵的武器要抓紧制造，抓紧装备，抓紧分配。”马天水心领神会，卖力大干，大搞阴谋诡计，背着中央，加快步伐，私造、私购了大量武器。一九七四年以来，他们在国家拨给的民兵装备计划经费外，又私自动用大量地方经费造枪、买枪。据统计，一九七四年擅自增加了七百十八万元；一九七五年又擅自增加了五百十五万元；今年

他们更是变本加厉，竟高达二千零五十万元，这同“四人帮”加紧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是密切相联的。

他们私设生产武器的工厂和车间。一九七四年前，王洪文等人就在一个工厂搞了一个专门车间，试验生产半自动步枪。以后，王洪文亲自窜到这个工厂“视察”，指使马天水等人决定正式投产，每年生产五千枝。一九七四年以来共生产了一万五千枝步枪。王洪文、马天水还瞒着中央有关部门，又私自安排另一个厂每年生产全自动步枪一万枝。一九七四年以来共私制了三万枝。应当指出，生产这些武器的干部和工人，是不知道“四人帮”和马、徐、王的阴谋诡计的，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他们私购军工生产超产的枪枝。一九七四年底有五个工厂超产了步枪一千四百六十二支，枪弹三百九十二万发。马天水等人不向军委有关部门报告，就从地方经费中拿出一百八十三万元，私自买了下来。

他们强行留下雷达指挥仪。一九七五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上海生产××型雷达指挥仪几十台，马天水、黄涛等人，竟趁机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不顾国家统筹安排，强行要留下一些归上海使用，并威胁中央有关部门，说什么：不给，就不生产。强行留下雷达指挥仪十台。

“四人帮”私造武器设立专门车间和生产线，被国家计委发现后，曾多次指出要他们纳入国家计划，但他们就是拒不执行，肆意对抗。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所指出的，梯也尔这个“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四人帮”也正是这样玩弄阴谋诡计、卑鄙奸诈的一伙，他们疯狂之极，私造武器，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妄图将革命人民浸入血泊之中。但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英明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们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也彻底破产了。

二、策划各种应变措施，为反革命武装叛乱准备物资。

“四人帮”为了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打着战备的幌子，还从粮食和副食品的储备上，密谋策划，加紧准备。今年一月份，反党分子张春桥在一份关于本市蔬菜供应问题的报告上，蛊惑人心地说什么：“靠各省、市越来越靠不住，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造反革命舆论。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以及马、徐、王加紧策划，加快准备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恶活动。黄金海这个黑干将叫嚷：“要为突然事件作好准备。”他迫不及待地要商业一局、二局、粮食局等单位准备“应变物资”。当时商业二局有一位负责同志生病在家，黄金海亲自上门煽动说：“现在斗争很激烈，要准备打仗，打起来要有副食品供应，最低限度要供应上酱菜咸菜。要组织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到各省采购，能加工的，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加工。”强令加工了一万二千六百担咸白菜，采购了四万担酱菜。他们还要水产局加工腌制咸鱼十万到二十万担。

王洪文以及马天水、徐景贤等人早在去年十月，还以检查战备库为名，察看了财贸部门的重点战备库所在地，打听各种物资的储备情况，从数量、质量、管理方法到通讯联络全都问遍。妄图把正常的战备设施和物资，为其反革命武装叛乱所用。当时，反党分子王洪文问到：“库存的稻谷打起仗来怎么办？”在有关人员回答说有机器可以加工时，王洪文连声说：“那就好了。”今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黄金海、施尚英又到这个战备库，专门召开会议，传达王洪文的黑指示，说什么：“要抓紧二期工程”。并说“要在战备库附近拉两个军的民兵，还要有汽车库、炮库”。黄金海还问：“打起仗来粮食可吃多少时间？”并且下令要造盐库、咸菜库。还提出要马上着手安装一台电话总机，

联通各个点，电话专用线不能通过民用线，也不能通过军用线，要直通市财贸组，直通市民兵指挥部。

他们还妄图把东海渔业指挥部设在本市的电台也控制起来，作为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的联络指挥工具。去年七、八月间，黄金海秉承“四人帮”以及马、徐、王的黑旨意，心怀鬼胎地问东海渔业指挥部办公室的负责同志：“你们的电台在必要时好不好指挥民兵？”黄金海还对在场的戴立清说：“将来也可以和你们三线基地进行电台联系”，等等。

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他们贼心不死，负隅顽抗，马、徐、王和黄金海之流，还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对抗党中央，对抗华主席。直到今年十月十三日下午，黄金海还布置，物资要作准备，对调往外地的物资要扣下一部分，对外地调进的物资，要尽快调进来，对外贸出口的物资要放慢出运速度，粮食仓库也要检查控制。从这一系列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以及马、徐、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是有计划、有预谋、有准备的。

毛主席说：“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四人帮”正是这样一股反动势力，他们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逆历史潮流而动，都是徒劳的，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领导下，彻底揭露、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必须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我们坚决要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此文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在区县局党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要不要坚持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的双重领导制度

上海警备区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恶毒攻击军事系统做民兵工作是“条条专政”，狂叫“要打烂军事一条线”。这是“四人帮”疯狂反对党对民兵工作的双重领导制度的无耻行径。

实行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工作的双重领导制度，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是坚持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保证党的绝对领导，防止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兵权的一项重大措施。党中央、中央军委早就明确指出：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既是军事系统的一个领导机构，又是各级地方党委的军事部。其主要任务是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具体实施民兵工作。在这里，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工作实行双重领导的关系是一清二楚的。这样做，既体现了毛主席一再强调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体现了党对武装力量的一元化领导和统一指挥，又可以发挥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两方面的积极性，把民兵建设搞好。因此，双重领导制度同“党指挥枪”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也证明，这种民兵领导制度是非常正确的。“四人帮”对这个行之有效的制度无比仇视，暴露了他们反对“党指挥枪”原则的丑恶嘴脸。

坚持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工作的双重领导制度，是我国民兵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我国民兵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武装组织，是我国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组成部分。它作为党的一

个群众组织，一定要服从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它又是担负着一定军事任务的群众武装组织，当然必须接受军事系统的领导。这样，才能保证党中央、中央军委对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才能增进民兵同解放军之间的亲密团结，协同作战，才能更好地组织部队做民兵工作，把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带到民兵队伍中去。“四人帮”竭力反对我国民兵的双重领导制度，竟敢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自成体系，另立章程，在上海擅自摘掉人武部门的牌子，停止区、县人武部和基层武装部的工作，取消警备区做民兵工作的权利，还声言民兵工作不受大军区和中央军委三总部的领导，把一切权力都抓到“四人帮”一手炮制的“民兵指挥部”的手里。人们早就提出：为什么军事系统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做民兵工作是“条条专政”，而他们的“指挥部”撇开党组织去指挥一切却是“党管武装”呢？原来，“四人帮”说的党，就是他们那个“帮”，他们要“打烂军事一条线”，就是要打掉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的双重领导制度，就是要分裂我国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重建”他们脱离党的领导、同人民解放军相对立的“第二武装”，建立他们的“帮派一条线”。他们的所谓“直接领导”就是“四人帮”“直接控制”，要民兵成为他们直接指挥的反革命“新军”，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杀人刀”。

要不要坚持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工作的双重领导制度，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大问题。我们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斗争的历史事实说明：只有坚持这种双重领导制度，才能保证我国广大民兵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斗争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我们一定要乘党的十一大的浩

荡东风，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我国民兵的优良传统，把民兵工作搞上去。

(原载一九七七年十月《东海民兵》第十期)

假左真右的法西斯黑货

——剖析“四人帮”鼓吹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恶毒用心

静安区人武部

“四人帮”苦心经营“第二武装”，把他们的那一套黑货吹嘘为“新生事物”、“新鲜经验”，以此骗人、吓人、整人，推行篡党、夺权、复辟的极右路线。其中，他们叫得最响、流毒最广、欺骗性最大的一条，是所谓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他们利用这个蛊惑人心的口号，诋毁民兵的光荣传统，改变民兵的性质任务，颠倒敌我关系，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大搞法西斯专政，干尽了反革命罪恶勾当。

“四人帮”打着“制止武斗”的旗号，到处制造武斗。他们用“第二武装”，以“制止武斗，解决老大难”为名，调动队伍查封中央各部和各地驻沪办事处，包围和进驻一些工厂、学校和科研单位，公然叫嚷“动手也没有关系”，大搞打、砸、抢、抄、抓。张春桥大言不惭地说：“工人武装制止武斗比解放军好，解放军有‘四个不’，受到限制。他们戴上一顶柳条帽……能打”。这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新鲜”吧。

“四人帮”打着“群众专政”的旗号，对广大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歪曲毛主席关于“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指示，叫嚷民兵指挥部是群众专政机关，“有权抓人、关人”。仅从我区民兵指挥部建立到粉碎“四人帮”为止，他们先后关押过四千余人次，其中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些完全是无辜群众，还有的是对“四人帮”及其余党不满的革命同志。而对他们的狐群狗党，那些货真价实的罪犯，却百般包

鹿。我区指挥部一个坏头头在一九七五年宪法公布后不久，向区委写报告，要把司法机关审批拘捕、少教、劳教的权夺过来。他们还在工厂、商店、菜场、戏院等到处搞什么“不挂牌子的派出所”，任意抓人、关人。他们还私设牢房，滥施肉刑，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式的恐怖统治。

“四人帮”打着“无产阶级要占领法律阵地”的旗号，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他们别出心裁地在我区一个工厂搞所谓“工人阶级占领法律阵地”的试点，胡说工人不要只会做“纱管”，还要当“法官”。规定该厂举办的“劳动学习班”可以撇开公安机关抓人、关人、审讯、定案。并盗用基层民兵组织的名义，鼓吹要由他们的“帮武装”来“立法、执法、管法”，煽动与人民法院“对着干”。

“四人帮”打着“揪走资派”的旗号，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为了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和市指挥部的坏头头，迫不及待地窜到我区旅社中心店民兵连，叫嚷民兵“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住党内走资派”。接着又盗用了这个基层民兵组织的名义，炮制了民兵的“主攻方向”是“揪走资派”的黑经验，并召开了所谓现场经验交流会，在全市介绍，强令全市六大饭店仿效推广，又向许多省市兜售。还编印下发了所谓民兵“主攻方向”的三课教育提纲，在民兵中大造“揪走资派”的反革命舆论，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内，以便实现他们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全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实现“改朝换代”的黄粱美梦。

“四人帮”打着“加强战备”和“反复辟”的旗号，妄图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四人帮”一伙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叫嚷要对付“突然事变”，多次进行军事预演，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刮起反军乱军的黑风，由市指挥部坏头头直接布置，搞了

把警备区作为当面之敌的秘密战备；他们又炮制了一个所谓“防止反革命暴乱实施方案”，并在我区搞了“夜间应急拉练”；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不久，他们又在我区突击下发了三千余件枪支、六十多万发子弹，加紧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军事准备。“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阴谋利用“第二武装”，策划对抗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就是在进行这样赤裸裸的反革命活动时，他们也没有忘记披上伪装，竟然假借中央军委的战备指示来发号施令，妄图把民兵绑上他们的反革命战车。但“四人帮”同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一样，极端虚弱、极为孤立。当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败露以后，广大民兵奋起造了他们的反。“四人帮”连同他们的“第二武装”一起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台，他们所谓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新鲜经验”的种种伪装，也成了我们识别“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反面教材。

“四人帮”鼓吹所谓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从根本上颠倒了敌我关系，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反动，是要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四人帮”把专政的对象颠倒了，行使“专政”权力的就是他们这一小撮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死硬分子。依靠这批社会渣滓抓“阶级斗争”，社会治安当然只会越抓越乱，闹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四人帮”鼓吹所谓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又是对民兵任务和作用的全面篡改。他们鼓吹民兵抓阶级斗争是“最好的练兵”，破坏民兵军事训练。他们污蔑对民兵进行国际形势和战备思想教育，是“只知道反侵略，不知道反复辟”。他们破坏劳武结合的原则，叫嚷“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要算政治帐，不能算经济帐”，长期地、大批地抽调民兵脱离生产。他们极力贬低军队和公安机关的作用，挑拨民兵和军

队的关系，胡说什么“军队不如民兵”，民兵要把公安工作“统起来”，等等。十分明显，“四人帮”就是妄图用其“帮武装”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四人帮”被粉碎了，所谓“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黑货，也正在被彻底清算。当前，我们要进一步揭批“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动实质，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模范地执行新宪法，按照新宪法赋予民兵的义务和职能，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应有贡献。

（选自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警备区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大会上的发言）

必须划清“帮武装”与民兵的界限

上海无线电十五厂民兵连

我们民兵连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曾有少数同志流露出了这样一种情绪：我们上海民兵过去成了“第二武装”，搞的都是修正主义那一套。因此，一提起“第二武装”，有的民兵就觉得不光采，有的民兵干部也觉得这个问题“讲起来糊涂，做起来更糊涂”，不敢大胆抓民兵工作。

广大民兵干部和民兵究竟是不是“第二武装”？执行的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发动全连民兵用毛主席有关民兵工作的指示为武器，以“四人帮”的反动谬论作靶子，联系我们连的实际进行分析，划清是非。大家回忆“四害”横行时，我们民兵是有抵制有斗争的。即使在“四人帮”的高压政策下，有的民兵和干部仍挺身而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厂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姜志元同志，就是其中一个。一九七五年，王洪文窜来上海加速搞“帮武装”的阴谋活动。老姜听了他的一些屁话，气愤地说：“这个人宣传毛泽东思想”。当听到“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时，老姜针锋相对地问：“那人武部干什么？”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阴谋搞武装叛乱时，我们厂突然发到几千发子弹，工会系统也突然过问起民兵的枪支弹药、兵力配备。这时，老姜和党支部研究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未经党支部集体讨论通过，任何人不得动用一枪一弹”，提醒全体民兵：“枪在手，弹上膛，一定要辨明方向。”还采取措施，加强武器保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许多同志说：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一些民

兵和干部顶压力，抗逆流，说出了我们民兵的心里话，代表了上海民兵的主流和本质方面，因此，绝不能把上海民兵与“第二武装”混为一谈。

“四害”横行时，我们没有看清他们的阴谋，执行过错误的东西，例如：“四人帮”鼓吹“三位一体”，我们执行了：“四人帮”大搞脱产小分队，开始我们顶了几次，但在高压强令下没能顶住。能不能因此就说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呢？大家认为，不能这样讲。我们看事情，必须看本质。从形式上看是搞了，但在实际工作中，总的说来我们还是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比如：我们被迫搞了“三位一体”，实际上内里还是三个部门，按老传统办事。“四人帮”鼓吹要“以造反派为基础”“重建”民兵，但我们始终坚持了党的阶级路线。在选拔民兵干部和批准基干民兵时，我们挑选的是经过党的长期教育的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和表现好的青年，而没有让那些所谓“造反精神强”的人掌握枪杆子。经过分析，大家清楚地看到，虽然“四人帮”篡夺了上海民兵的领导权，但他们极为孤立，广大干部、民兵没有跟他们走。他们为非作歹，从来不得人心，绝不能代表上海民兵。

民兵们在分析中讲到，我们民兵连有些同志，过去也讲过错话，办过错事。对这些问题，要注意具体分析，特别要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四人帮”在民兵中搞帮派体系，其主要骨干是流氓、阿飞、打砸抢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只是一小撮。因此，决不能认为有缺点错误的民兵和干部，就是“帮武装”。

通过典型分析、路线对比，全连民兵把“帮武装”与民兵的界限归纳成“八个不同”：“帮武装”是枪指挥党的“第二武装”，民兵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武装；“帮武装”结帮营私的大杂烩，民兵是坚持党的阶级路线的组织；“帮武装”是反军乱军的急先锋，民兵是解放军的有力助手；

“帮武装”是镇压人民的打手，民兵是保护人民的子弟兵；“帮武装”践踏党纪国法，民兵奉公守法；“帮武装”是破坏生产的败家子，民兵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闯将；“帮武装”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枪杆，民兵是保护红色江山的战斗队；“帮武装”是损公肥私的蛀虫，民兵是一心为公的战士。由于分清了是非，全连干部战士大办民兵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干部敢抓民兵工作，民兵积极参加活动，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比干劲，当闯将，和全厂职工一起超额百分之二十完成了一九七七年生产计划，今年一、二月又实现了“开门红”。军事训练方面，全连男女基干民兵步枪、重机枪第一练习实弹射击考核成绩总评优秀。全连民兵工作出现了一个大干快上的新局面，被评为市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先进单位。在欢庆五届人大胜利召开的大喜日子里，我们发动全连民兵认真总结经验、找差距，制订全年民兵工作规划。大家决心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争取新的胜利。

(原载一九七八年第四期《东海民兵》)

驳斥“四人帮”对民兵的诬蔑

杨浦区人武部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肆意攻击文化大革命前的民兵“没有战斗力”，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民兵工作中占主导地位，狂叫要由他们来“解决路线”问题。对此，必须彻底批判。

众所周知，我国民兵是毛主席亲自创建和培育起来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从小到大，不断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毛主席又为加强民兵建设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如把民兵制度定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制定了民兵工作的暂行条例，进一步确定了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等等。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发出了“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的伟大号召，把我国民兵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又作出了“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重要指示，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兵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就拿我们杨浦区来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民兵组织迅速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已有民兵二十五万多人，不仅建立了民兵连、营、团的单位，还建立了民兵师，配了较强的干部，坚持经常有活动；民兵武器装备从无到有，旧杂式武器正逐步改装为新式武器；民兵军政素质有了较大提高。特别在一九六四年，广大民兵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苦练杀敌本领，成绩显著，有十多个单位的民兵对外进行军事表演，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已先后接待了来自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的外国朋友，较好地宣传了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广大民兵一手抓生产，一手握枪杆，较好地

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大量事实证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民兵工作，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正由于毛主席的民兵工作路线在广大民兵的头脑中扎了深根，所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一开始就遭到了广大民兵和人武干部的抵制和斗争。他们在我区搞“第二武装”，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是第一个在我区搞所谓“三位一体”；是第一个在我区搞什么“民兵指挥部”和武装部“两部合并”；又在我区派出民兵小分队进驻里弄“抓社会阶级斗争”。他们满以为他们那套“新鲜经验”成功了，用“第二武装”进行反党有把握了，声称“对杨浦区是信得过的”。殊不知，广大民兵就是不吃“四人帮”那一套。当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区广大民兵就奋起造了“四人帮”的反，使他们长期策划、妄图在行将灭亡之时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了产。

“四人帮”污蔑文化大革命前的民兵“没有战斗力”，说什么“如果路线正确，就不会这样”，这是明目张胆地把矛头对着毛主席。他们狂叫要“解决路线”问题，就是要用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改造”我国民兵，使之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杀人刀。然而，“四人帮”的痴心妄想是不能得逞的。华主席率领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我们要乘胜追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民兵工作路线，恢复和发扬民兵的光荣传统，遵照毛主席和华主席的指示，把民兵工作迅速搞上去。

（原载一九七八年一月《东海民兵》第一期）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二十二)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一九八一年一月

“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